

階級論

鄧
初民著

吾有階級的社會，不懂得階級，是
不能懂得社會的分子，更不能懂得政
治的分子。階級與階級，為正確了解
社會的分子，為正確領導社會，
如欲一戰而勝，必有階級是不犯
錯誤的。
著者識

階 級 論

鄧 初 民 著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一 月

目錄

階級論

自序

- 一 階級的意義和本質
- 二 科學的階級理論之形成過程
- 三 階級的起源
- 四 階級關係的歷史性
- 五 階級和階級鬥爭具體的歷史過程
- 六 中國現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

附錄

- 一 社會主義社會的知識份子
- 二 斯大林論蘇維埃知識界
- 三 論知識份子的改造

自序

這本小書，是在本學期講授『政治學』裏面的一部份，也可以說是最基本的一部份。因為政治關係是以階級矛盾爲其主要內容的。何況在有階級的社會，如果不懂得階級，就不可能懂得社會科學，更不可能懂得政治鬥爭的戰略戰術。爲了在政治鬥爭上，明確的分清敵友關係；在革命戰線上正確的領導革命的統一戰線，只有階級是不犯錯誤的。

我們要清楚明白地區別出某一個人，或某一黨派，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嗎？首先就要搞清楚某一個人是屬於那一階級；某一黨派是代表那一階級的利益。在有階級的社會裏，決沒有外於階級的孤立的個人，也沒有超然於階級之上的黨派。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所領導的法西斯黨，不過是他們所屬的階級——金融寡頭或獨佔資產階級，在迫使他們『跳加冠』，『翻筋斗』，瘋狂、尋死。所以如果有人，儘管是最好心腸的人，希望或勸告蔣××不要獨裁、內戰，不要出賣民族利益，不要與全中國人民爲敵。即令蔣××答應了，陳立夫、陳果夫、陳誠之流，也是決不會答應的，這就是說他所屬的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決不會答應。因此，他的階級的反動性，註定了他是中國人民不折不扣的死敵。如果有人，儘管是最好心腸的人，希望或勸告杜魯門、馬歇爾，不要侵華、援蔣，不

要侵略世界，支援世界反動勢力。卽令杜魯門、馬歇爾答應了，魏德邁、赫爾利，周以德之流，也是決不會答應的，這就是說他們所屬的階級，決不會答應。因此，他們的階級的反動性，註定了他們是世界人民不折不扣的死敵。

反之，什麼是中國與世界人民的朋友、友軍、或同盟軍，也只有從其階級的屬性來決定。

一個革命的階級和代表革命階級利益的政黨，也就只有從階級的剖析出發，來分別敵友，來領導革命的統一戰線。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曾說：

『中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完全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就必要在各種不同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革命的階級，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綫。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鞏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見所著『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

這正是很嚴正的從階級的剖析出發所得出來的結論。每一個人和黨派，究竟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只有它所屬的階級能清楚地明白地告訴我們。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階級的反映也就越明顯。當中共土地法大綱公佈以後，當自由叢刊之九，標題爲『路只有一條』的幾篇批評文章刊出以後

，在港九的許多人士中，曾經起過一些小地波動——包括善意的和不善意的——，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只是由於各人的看法不同，實際上則是所謂階級屬性在作怪。

這本小書，把自有階級以來各階級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作了一般的客觀的分析和論述；又把中國現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作了一般的客觀的分析和論述。不敢說詳盡，不敢說沒有錯誤，爲應同學們的要求，而且由同學們集資把它印出來，或者能供初學社會科學者及給與實際政治鬥爭的戰友們萬一之參考。

再因爲筆者本身是屬於知識份子羣的，而讀到本書的讀者以及我敬愛的同學們，都不外是知識份子或準知識份子。對於知識份子羣這一部份，自己感覺說得不够，而且說得不明晰，特將論知識份子的三篇力作，附錄在本書後面。

一九四八·一·廿三·於九龍私寓。

階級論

一 階級的意義和本質

政治是以階級矛盾爲其主要內容的，社會裏面有了階級，就有階級鬥爭。「以往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東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總是處在互相的經常對立之中，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藏，有時公開的鬥爭……」（見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各方面，成爲社會自己運動之惟一的推動力。然而這並不是說三方面的鬥爭是無分軒輊的，只有政治鬥爭（包括軍事鬥爭）採取最積極的形態，而且最集中的表現出來。所以馬克斯有一句名言：「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方面表示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之最積極最集中的形態，另一方面又表示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和最重要的手段。因爲政治鬥爭，即是向着社會上層的建築的政治來革命的鬥爭，亦即推翻舊政權，創建新政權的鬥爭，工人階級或工農羣衆爲保障其本身經濟利益而進行的經濟鬥爭，爲打倒落後的反動的舊文化（社會思想意識），創建進步的革命的新文化而進行的文化鬥爭，固然都是很重要的，而且經濟、文化鬥爭，常



常與政治鬥爭相錯綜，有時并可轉變為政治鬥爭。可是經濟文化鬥爭，決不能與政治鬥爭相脫離，否則沒有政治鬥爭的勝利，也決沒有經濟文化鬥爭的勝利。很明顯的例證，就是假如不經過艱苦的政治鬥爭（包括和平鬥爭方式與武裝鬥爭方式）來結束中國的獨裁統治，則一切經濟、文化的被壓迫，被奴役，決無由獲得解放。而且在經濟、文化鬥爭，沒有轉變為政治鬥爭以前，決不就等於政治鬥爭。所以有人想根據馬克斯這句名言，來混淆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文化鬥爭的區別，甚至想拿經濟鬥爭來代替政治鬥爭，以為只要有了經濟鬥爭，就可以不要再有政治鬥爭而獲得鬥爭的勝利，這只是經濟主義者想取消政治鬥爭，出賣工人階級或工農羣衆利益的企圖；反之以為只要有了政治鬥爭，就可以不要經濟鬥爭，文化鬥爭，這也同樣是錯誤的。這裏的論點，是需要把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文化鬥爭適當的配合起來，而又不忽視政治鬥爭是最積極最集中的形態，同時又是最高形式和最重要的手段，換言之，即經濟、文化鬥爭，都要服從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所以成爲階級鬥爭最積極最集中的形態，同時又是階級鬥爭之最高形式和最重要的手段。這是因爲階級關係浸透在一切社會關係之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關係），首先就不能不是政治關係，可以說政治關係，原來就是從階級關係產生出來的，無階級的社會，即是一個無政治的社會，然而經濟關係、文化關係，却與階級的有無沒有直接的因緣，因爲，社會沒有階級之前，就有了經濟和文化，社會沒有階級之後，同樣會有經濟和文化，而且那時的經濟、文化還會有高度的發展。只有

政治關係是直接從階級關係產生出來的。階級關係反映到政治關係上，就表現為政治上的統治和被統治，政治上的統治和被統治，自然又根源於經濟上的剝削和被剝削，所以階級矛盾，其具體的內容，就是經濟上的剝削和被剝削，政治上的統治和被統治的矛盾。因此，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能被調和的，矛盾的解消，必然要經由固執的階級鬥爭。因此，在有階級的社會歷史上、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必然就是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反之，經濟上的被剝削階級，必然就是政治上的被統治階級。在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裏，尤其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裏，這一點就完全明白而露骨的表現了出來。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如果沒有政治上的統治（政權——包含軍警憲特），是不可能保持其剝削地位的，所以政治的統治、壓迫、鬥爭，就成爲保持其剝削地位的工具。經濟上被剝削，政治上被統治的階級，是既沒有經濟權，又沒有政治權的，然而到剝削統治得太利害時，它也只有以政治鬥爭來答覆政治鬥爭。古代社會，斯巴達領導的十五萬奴隸軍，曾經跟當時奴隸主的政府作戰三年，封建社會，農民暴動，農民戰爭也差不多與整個中世紀相終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亦一致奮起向着它的敵人進擊，而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爲階級矛盾最後的歷史形態，因而也就是兩階級鬥爭的最後決戰，其慘烈要超過任何時代，是不待言的。

所以階級在政治學中的重要性，是和商品在經濟學中的重要性一樣的。沒有商品之甚深的，正確的分析，經濟學是無從說起的，沒有階級之甚深的，正確的分析，政治學也是無從說起的。

然則階級是什麼呢？

階級是拿什麼東西作為其質的特徵或質的規定呢？

一般的說：階級是一個歷史的範疇，它是跟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準相結合的現象。換言之，即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社會就產生了階級，又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社會又歸於無階級（階級消滅）。因為社會階級的有無，是跟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準相結合的。然而那怕到了現在，社會上却有些人們一口咬定整個人類社會是無階級的，尤其是說在近代民主國家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國家的關係都是平等的，即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不管他們在實質上、經濟上是否平等。因此，如果有人要在口頭上或書本上提出階級問題，承認階級之客觀的存在，他們就說你是在鼓吹階級鬥爭，破壞社會秩序。他們不把階級鬥爭看做人類社會自己運動的動力；看做世界變革的重要因素，看做人類社會之人的能動性的契機，看做被剝削、被統治階級之革命的實踐，而把它看做一種社會秩序的叛逆。這種否認社會階級之客觀存在的人是什麼人呢？也就是社會上的剝削、統治階級。正因為他們要保持他們的剝削、統治的社會秩序，所以把一切被剝削、被統治階級的革命運動（階級鬥爭）看做破壞社會秩序的叛逆，甚至於想拿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亦即所謂民主國家的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的假象來遮住實質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進而否認階級存在與階級鬥爭。這是一。另外又有些人們恰與此相反，不僅承認社會上有階級，而且以為這種

社會階級，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有的，它是萬古長存的，超歷史的，因為他們說人類之有賢愚智不肖的不齊，社會之有貧富貴賤的不平等，這是一種自然的秩序。這種主張，是把『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生物學的法則，移用於社會，即把人類社會階級的區分看做是根源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自然法則。因此，他們便說什麼剝削、統治階級，是原來具有一種優越的天賦的優勝集團；而被剝削、被統治階級，則是天生的劣等愚昧集團。而爲剝削、爲統治階級服務的優生學者們，也就跟着他們瞎吹法螺，說什麼常常能從富貴權門之中，亦即剝削、統治階級之中，看出優越的遺傳素質；反之，則認爲工農大眾，亦即被剝削、被統治階級，在知能上和道德上都是先天的劣等愚昧的。事實是否如此呢？在剝削、統治階級中，縱然不可否認的也有幾許天才傑出人物；在被剝削、被統治階級中，縱然不可否認的也有許多低能兒，愚昧者，那也只因爲剝削統治階級的富有，在任何方面（例如營養、生活、教育諸方面），都享有有利的機會；反之，被剝削、被統治階級，由於只能保有最低限度的生活，甚至連最低限度生活都不可能，因而在各種機會方面都無從與剝削、統治階級平等，所以把所有天才都被損耗、被摧殘了。怎能拿『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自然法則來作爲社會階級區分的根據呢？又怎樣能拿這作爲社會階級之超歷史的永久的規定呢？這種承認社會階級之存在，并承認其超歷史的永久的存在的人們，也就是社會上的剝削統治階級。因爲他們要把階級存在的永久化，作爲其剝削、統治地位的永久合理化之根據。這是一。否認階級之客觀存在的，是剝削、統治階級，

爲的保持其剝削、統治地位，不願意被剝削，被統治階級，向之作破壞其剝削、統治社會秩序的階級鬥爭；承認階級之存在，而且把它看作是超歷史的永久的存在的，也是剝削、統治階級。剝削、統治階級，從其剝削、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既可以這樣顛倒黑白，難怪中國秦代權相名叫趙高的早就「指鹿爲馬」了啊！

畢竟階級之客觀的存在，是剝削統治階級無法否認的；而階級的存在，必然要導入階級鬥爭，被剝削、被統治階級之革命的實踐，（亦即階級鬥爭）畢竟要使剝削、統治階級，從其剝削、統治地位，不斷的倒下來，階級的存在也不是超歷史的，永久的。因而剝削、統治階級及其代言人，總不願觸及階級關係的本質及其具體特徵。於是就在階級理論上，大散佈其似是而非的謔言。所以我們爲的要澈底闡明什麼是階級之質的特徵或質的規定，首先就要把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拿來加以審核，換言之，我們爲的要澈底闡明什麼是「階級」，首先就要審核什麼是「非階級」。在階級理論上有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呢？

第一、就是把貧富的差別來說明階級的區分，把財產的大小，把錢櫃的盈虛，看作階級區分的標準，這我們可以把他叫作「數量的階級論」。這種說法，自然會把財產大、錢多而富有的人，看成一個階級，看成資產階級；把財產小、錢少而貧乏的人，看成一個階級，看成無產階級，而且認爲貧富的懸殊越大，階級的區分就越分明。反之，如僅有貧富，而貧富的懸殊并不大，則不能算有階級。例

如就有人說：中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分，中國社會就無所謂階級對立。這種階級理論如能成立，則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也不能沒有貧富的懸殊，而且其懸殊也是很大的，有萬萬、千萬、百萬的富翁，也有僱傭幾十個工人的小廠主，有僅够最低生活的苦力，也有接近資本家生活的貴族工人。那它不是同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又要按其貧富的差異分出許多階級來嗎？實際上，儘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中都有不同的『階級中的階層』，例如資產階級中有財政資本家，重工業資本家、輕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其貧富與其各自的利益雖有不同之處，然其同爲剝削、統治階級則一。再如無產階級中，也有上層貴族工人，也有工資只能維持其最低生活，甚至連最低生活都不能維持的工人，其貧富與其各自的利益，雖亦有不同之處，然其同爲被剝削、被統治階級則一。階級關係，在本質上即是一種剝削、統治與被剝削、被統治關係。其最深的根則植基於生產和生產方法的發展，同時，又由於發展的不充分，是不待說的。抽掉了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而談階級關係，將一無是處，數量的階級理論，只是剝削、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之又一欺騙而已。

第二、就是把職業的差別看做階級的區分，他們認爲社會上有士農工商各種不同的職業，就有各種不同的階級，就現代的社會來說，有醫生，有律師、有教授、有工程師、有裁縫、有皮匠、有泥水匠……各種不同的職業，也就有各種不同的階級。這我們把它叫做『職業的階級論』。根據這種說法，任何社會都有分工，因而就有職業上的區別，因而任何社會都有階級的區別。殊不知分工，是在生

產力稍許發展的生產關係中，都可能看到的，即在無階級剝削關係的原始共產社會中，即已存在的，而在將來的生產力非常發展的生產關係中，亦即將來無階級剝削關係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也是會存在的，而且會要愈分愈細的，這那里能把它拿來作爲階級區別的標準呢？這種階級理論，也是抽掉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階級關係之質的特徵，而空談階級關係，也是剝削統治階級及其代言之有意的朦混。縱然在現社會及任何有階級的社會中，筋肉勞動和腦力勞動間，農村勞動和城市工作間，存有極懸殊的不平等，而且任何人若一陷入於某種職業界，即爲所束縛而不易轉業（不論你願意與否），這仍只是各個人在社會分工中，在社會勞動組織中之任務上的區別，還不是階級的區別，各個人社會上的分工，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担负的任務，縱然也有苦樂上的不平等，還不就是這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不平等。這種苦樂不均，固然也是由於階級社會造成的，然而職業決不就是階級。

第三、比這些說法進了一歩的，是所謂『收入源泉的階級論』，這是由舊俄的修正主義者茲甘·巴蘭諾夫斯基（Tugan Baranovsky），和考茨基所主張的。其特徵是在收入源泉的差別中找出階級差別的最後根據。考茨基在一九〇三年他的一篇論文裏（題目叫做：『階級的利害——特殊利害——共同利害』），曾給階級這樣的規定：『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東西構成個階級的了。那就是：除了收入源泉的共同性之外，還有從那裏生出來的利害共同性，及對其他階級對立的共同性。個個階級

力使自己的收入源泉更爲豐富，而使其他階級的收入縮小。」考茨基這個理論，他自己說是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三卷最後一章留下來的未完結的階級理論之完成。不錯，馬克斯曾在這章提出工資勞動者，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爲近代的三大階級，接着還這樣提出問題：『使工資勞動者，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三大階級的是什麼呢？』於是他這樣答道：『它看起來似乎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源性。這三大集團的構成分子，即構成他們的個個人，各由勞動工資，利潤，與地租來謀生活的，即他們各以自己的勞動力，自己的資本，和自己的土地所有來生活的。』但他跟着就說，如果根據這個見解，以收入和收入的源泉來區分階級的見解，那麼，醫生和官吏就要構成兩個不同的階級，那麼，『同樣的事（即以收入和收入源泉來區分階級的事——筆者），就是對於社會分工，在勞動者之間，和同樣在資本家們或土地所有者們之間所生出的利害上的和地位上的無限細分，也是妥當的嗎？——例如土地所有者，可以細分爲葡萄園的所有者，森林的所有者，鑛山的所有者，漁場的所有者』。『資本論』就在這裏中斷着。這樣看來，考茨基明明是把馬克斯自己所否認了的見解當做馬克斯的見解完成了。馬克斯說：收入的源泉是同社會的分工一樣可以無限的細分，因而在利害上也可以無限的細分。然而考茨基却以爲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是靠着犧牲勞動工資或資本利潤來實現的，土地所有者之間並無利害上的不同；同時，勞動工資也是以犧牲資本利潤或地租來提高的，一個工人工資的增大，不但不會減少另一個工人的工資，反而會提高另一個工人的工資。他根據這些就得出上面他所說的結論

來。然而我們試就資本家來看，資本家集團間，托辣斯間，卡特爾間利害的對立衝突，不是使希爾費丁，考茨基的盟友——所提倡的「組織了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完全破產了嗎？資本家收入的源泉——利潤——是從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來的，因而整個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有着共同的利害，是不待言的，但這決不排除在資本家間仍有利害的不一致。考茨基在收入源泉的共同性及由此生出的利害的共同性上，又附了一個「對其他階級對立的共同性」，依然救不了他的理論的弱點。第一，階級對立的根據，并非單純由於收入源泉的差別，第二，以收入源泉作為階級對立的根據，他所說的對其他階級對立的共同性，是不包含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敵對的。因為如果如考茨基所說：「各個階級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源泉更爲豐富而使其他階級收入縮小」，而不是根本破壞，消滅其他階級收入的源泉，那麼，這種對立便不過是因收入量的大小而發生出來的罷了。結果勞動者對於資本家的鬥爭，也必然只限於工資多少的問題，而不是變更剝削與被剝削關係的問題，更不是要澈底破壞與其利益相敵對的生產關係問題。這仍然是有意抽掉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來談階級關係的變種。這種以收入源泉作為階級區分標準的理論，也可以叫做「分配說的階級論」，因爲收入源泉的內容，即是生產物的分配，考茨基也知道這種理由太不充分，於是爲了補充生產物的分配說，又進而說明生產手段的分配，是規定階級關係的契機，他說：「階級的問題是生產手段及以它來生產的生產物的支配問題。……這樣，我們在剝削和因剝削而發生階級對立的基礎上，常常一方面看出生產手段的佔有

或對它的支配權這個事實；而另一方面則看出那沒有生產手段的事實。」不錯，生產手段的佔有與不佔有，即生產手段的分配，是決定階級剝削關係的，但生產手段的分配，也應有其決定者。然則決定生產手段的分配的又是什麼呢？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其最深的根，則植基於生產和生產方法的發展，同時，又由於其發展的不充分。」換言之，生產手段的分配又是由一定的生產和生產方法決定的。所以生產手段的分配，在階級關係上無論怎樣成爲重要的標誌，然而它決不能形成階級關係之最後的出發點。但是考茨基却把生產手段的分配從其基礎的生產分離了，所以他的見解仍然是分配論的。他不過是從生產物的分配論進到較高的生產手段的分配論罷了。如果不把生產手段的分配和其決定者的生產和生產方法有着正確的理解，而把前者從後者分離開來的時候，則階級的起源，便要從在社會物質的生產中看出階級起源之基礎的理論，跑到武力說——征服說去，考茨基正是這樣做了。

第四，就是武力說的階級論。因爲人們如果不能從生產或生產方法中找出階級起源的基礎，一吓跑到武力說，征服說去，這是絲毫不足爲奇的。而考茨基的所謂征服，乃是指的遊牧種族對於農業種族的征服，因而也可叫做「人種論的階級論。」考茨基否認「在原始共同體內的生產發展中看出階級和國家發生原因的恩格斯的假說」，提倡資產階級學者辜姆朴羅威茲（Cudwing Gumplovieg）與本海馬（Frang Oppenheimer）之流的典型的武力說——征服說。他曾說：「從原始共同體內所發生的各種要因，去說明階級和國家形成的嘗試，是不會得出什麼滿意的結果的。」因爲原始共同體內

『原始的民主，許多重要生產手段的共有，一般對各個成員之扶助，築了一道防止一切社會向着下面方向去發展的難越的堤防；那就是剝削階級之階級形成的方向，以及那支配共同體，從住民大眾獨立起來的國家權力之形成的方向。』因而他主張：『我們應把國家的發生及階級之出現，還原爲征服。』他還很誇張的說：『在他還不知道馬克斯主義，而是達爾文主義的追隨者的時代，即比辜姆朴羅威茲著作『人種鬥爭』（一八八三）還要早的時代，就到達了征服說。』同時，他非難辜姆朴羅威茲的征服說，不會說明征服可能的經濟條件，而加以補充的說明。但他所謂經濟條件，是專指那定住的農業種族和遊牧種族之征服與被征服的生活條件而言。他說農業種族和遊牧種族，因爲其生活條件不同，所以獲得了不同的心理與能力，這樣就使遊牧種族可能征服農業種族，由於征服種族與被征服種族的出現，就出現了階級與國家。他說：『我們如果把農業民跟遊牧民的精神生活上的深刻對立，加以考察的話，即如果把前者的那種富裕，但却遲鈍，大意，順從，與後者的那種貧困，武裝力的冒險慾，然而又往往富於有生氣的適應能力的知能，拿來加以考察的話，那麼，我們便可以看到農業民和遊牧民這兩要因的接觸，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就必然要導致於遊牧民使農業民隸屬於自己，而使其負納貢的義務的結果。』像從這樣征服說來說明階級和國家的發生的考茨基，就不承認國家是由於原始共同體內予盾對立達到一定成熟的階段上發生的，而主張『使最初各階級發生的那個同樣行爲（即征服）也形成了最初的國家。』征服說的經濟條件，即僅僅由於農業種族與遊牧種族的不同，亦即單純由於

種族的不同。則各種不同的階級，在考茨基看來，也就是各種不同的種族。因此，我們便可以從考茨基的征服說中，看出很濃厚的人種論的要素來。看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因素來，這也就是把「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自然法則，移用於社會的變種，後來且成爲法西斯主義階級論的根據。武力說的階級論，是錯誤的，我們不能不加以批判。當考茨基指出階級的標誌，是生產手段的分配時，原是正確的，其錯誤在他沒有把生產手段的分配，看做生產發展的結果，而反以爲是由武力來決定的，換言之，即他沒有從共同體內矛盾之發展去說明階級之發生，反而從其外，拿一個種族征服另一個種族去說明階級的發生，這樣，他就放棄了一切運動發展由於內在矛盾的辯證法的見解。事實上，奴隸的發生是共同體內生產力的發展引起內在矛盾的結果，戰爭的俘虜，是在生產力發達的一定階段上才轉化爲奴隸的，以後的債務奴隸，及共同體內貧富之日趨懸殊，和一定社會職務之從社會獨立，無一不是由於共同體內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至於所以造成生產手段分配的不平均，例如奴隸主人佔有一切生產手段，而且把奴隸（人）也當做生產手段佔有，而奴隸則一無所有，連自己的身體也非其所有，同樣是由於共同體內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所以階級與國家的發生，決不是貧困，勇敢而且富有智能的遊牧民，以武力征服富裕，但却遲鈍、大意，順從的農業民的結果。至於資本家和勞動者階級的形成史，更加明顯的足以證明武力說——征服說的錯誤。在資本的原始蓄積上，我們承認武力是槓桿，但武力本身決不能產生出新的生產方法。在一個極端，出現了可以成爲資本的一定數額的貨幣所有者；在另一

個極端，出現了只有出賣自己勞動力才能維持生活的勞動者，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也就出現了。然而這一現象從那裏來的呢？那是由於商品生產，商業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一方面財富都集中到一部分手工業者，商品生產者，或商人手中；而另一方面，則使多數手工業者，乃至農村家內工業，都被那些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所奴役而零落。同時，即隨貨幣經濟的發展而加重起來封建地主之剝削，又產生多數無地農民等等，於是前者便成爲資本家，後者便成爲勞動者。而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的兩大階級的對立。這種新的生產方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產生出來的，決不是什麼武力，征服產生出來的。武力至多只能起槓桿的作用，起促進這一過程的作用，所以武力是要建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受它的規定才能起一種「經濟的力」的作用的。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的分配，資本主義的所有關係，也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而不是武力的結果。武力在這裏，不過在促進的過程上，起「溫室般地育成」作用，而決不能是過程的原因或出發點。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切所有關係，階級關係的發生，都需以生產和生產方法之內在的發展爲其根本原因，因此，當我們要正確的說明階級的特質時，就不許僅以生產物的分配（收入源泉）或生產手段的分配爲標誌。生產物的分配，雖是從生產手段的分配歸結來的，但生產手段的分配，又必然由於生產發展的結果。生產手段的分配，儘管也是標誌階級關係的特徵的東西，但在離開生產本身來考察生產手段的分配時，就不可避免的要歪到考茨基的武力說去了。

第五，除了以上四種階級理論外，還有人從生產中的技術作用和配置，引申出社會階級的分解。

例如波格達諾夫的階級論就是這樣的。照波氏看來，在生產的技術上，把勞動分成組織者的勞動與執行者的勞動兩種，就是社會分成剝削的基礎和原因。這種看法，很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在原始共同體內，也有勞動的組織者，與執行者，但在那時勞動的組織者，並不就是生產手段的佔有者，勞動的執行者，也並不就是生產手段的喪失者，這在現今蘇聯社會主義的企業中亦然。因為階級存在的基礎，不能不是生產手段私有以後的事。所謂勞動的組織者，就是管理企業的人，這是因為他就是私有（所有）該企業的人。換言之，資本家，不因為他管理該企業，才成為資本家的；倒因為他是私有該企業的人，即因為他是資本家，才成了企業的管理者，組織者的。波格達諾夫把階級分成組織者的階級和執行者的階級，又是為的把階級關係抽掉，拿這去遮掩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并蒙蔽這種剝削的根源和基礎，這種階級理論，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技術的或組織的階級論，布哈林對階級的理解，也是接近於這種理論的，他的階級定義是這樣：『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起同一作用的，而在生產過程上對其他人們處於同一關係的人們之總體；這時，這些關係還在物之中表現出來。』布哈林把在生產過程上對其他人們處於同一關係，作為階級的主要標誌，這就不得不把各種不同的，甚至敵對的階級，歸納到一個階級中，例如富農就在生產過程上常常是和他所用的僱農，處於同一關係，并肩工作，即他們是在生產的技術上起同一作用的。然而他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及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却是敵

對的：一個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和剝削者（富農）；另一個則是生產手段的喪失者和被剝削者（僱農）。布哈林如此規定階級的用意，毫無疑義的也是在抽掉這種剝削與被剝削關係。

第六，我們要特別提出法西斯主義的階級論來加以審核。根據法西斯主義的說法，社會中是沒有階級的，所謂階級和階級矛盾，都是「馬克斯主義的鬼話」，但社會中却有各種不同的人種。人類的全部歷史，不是階級鬥爭史，而是人種鬥爭史。因此，他們認為不是一切人種都有同樣存在的價值，在人種的差別中：一種是優秀的高級的人種，上天賦與了他們的全智全能，並因此預定了要他們去統治其餘的劣等的低能的人種。所以過去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就認為只有日耳曼民族是這樣優秀的高級的人種，日本法西斯主義者認為只有大和民族是這樣的優秀的高級的人種。法西斯的人種論，很顯然的是在利用人種的差別來緩和階級的對立，來混淆階級的觀念，因此，引誘被剝削被統治階級離開階級鬥爭，離開革命的實踐，以便建立他們狂暴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獸性的帝國主義和愛國主義，實際上好擴張其殖民政策，侵略政策。那時具體的對象，却在用野獸般的嫌惡，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來反對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來反對蘇聯，反對民主。法西斯主義在獨佔資本的統治下關於「民族統一」「血的共同性」的喧鬧，不過是一種無恥的宣傳吧了，這種宣傳當然也是在於掩蔽對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殘酷的剝削，壓迫，鬆弛尖銳化的階級矛盾。這種理論是直接導源於人種論的。

以上我們把許多似是而非的階級論——數量的階級論，職業的階級論，收入源泉（亦即分配）的階級論，人種論（亦即武力——征服）的階級論，組織的階級論，法西斯主義的階級論，都提出來加以說明和批判了。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提出正確的，科學的階級論來。

依据上面所說，我們決不能拿『數量』，『職業』等等來作為階級之質的特徵或質的規定，同時，也不能單拿生產物的分配（收入源泉），乃至不能單拿生產手段的分配（所有關係或佔有關係）來作為階級之質的特徵或質的規定。因為生產物的分配，明明是生產手段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手段的分配，又是生產本身發展的結果。所謂生產手段的分配，又是生產本身發展的結果的意思，那就是說：需要在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勞動組織，亦即社會的經濟結構之中，去找分配的基礎。例如就拿資本主義的場合來說吧！當手工業從農業分離時，都市從農村分離時（此即社會的分工），商品生產發展時，封建的自然經濟便行分解（此即生產手段的分配將要變換），於是生產手段資本主義式的分配，便經過那建築在商品生產之上的商業資本之發展，而開始自然而然的發生和進行了。我們再拿奴隸社會發展的場合來說，并不是由於牧人種族之征服農業種族，乃是由於牧人種族與農業種族之間的交換，使種族共同體內部的交換發生和發展，因此進一步通過這種交換，使內部的社會分工發生和發展，於是內部的矛盾也發展了。這種矛盾就是勞動力需要之增大（這增大是受那與社會分工之發展而同時發達了的生產力的規定的），與不能照應它的共同體的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這矛盾後來就使奴隸社會的

出現把它揚棄掉。如像考茨基一樣，把共同體內部的矛盾否定了，而把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的征服，看成是規定生產手段分配的先決條件，那縱然他還說什麼征服的經濟條件，依然是空談。所以如果沒有把所有關係，階級關係之發生發展和揚棄它的根本原因，到那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勞動組織，亦即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去找，那麼，生產手段的分配就要從生產脫離關係了。換言之，所有關係，分配關係，完全是生產發展的結果，其根子，其原因，在社會經濟結構之中，亦即在社會勞動組織之中，而不是由於武力征服。這樣，它使各種歷史的階級敵對形態，貫穿在各種社會的勞動組織，各種社會的經濟結構，亦即生產的社會體制之中。所以生產物的分配，雖然也表現階級關係，但那只是從生產手段的分配歸結來的，生產手段的分配，雖然更能表現階級關係，但其根子在生產的社會體制之中。不過我們千萬不能忽視，階級關係，必然又要由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來標誌以特定的社會的質。換言之，如果抽掉了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也就沒有什麼叫做階級矛盾了。否則（如果僅僅是量的大小貧富）階級矛盾也就可以調和了。我們必需考慮到上說種種問題，我們才能得出階級之科學的定義來。階級之最正確的最科學的定義當如下：

『所謂階級者，乃是根據它在那被歷史規定了的社會的生產體制中的地位；根據它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分被法律所確保和固定化着）；根據它在社會勞動組織內的作用；因而根據分配給它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規模及所能支配的財產之大小，來互相區別的人類集團。所謂階級者，

乃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內所處地位之不同，這一羣人可以掠奪另一羣人的勞動的這樣的人類集團。」（列寧：『偉大的開始』）

若把這個定義所說的每一項排列起來則爲：

- 一、根據它被歷史規定了的社會的生產體制中的地位；
- 二、根據它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分被法律所確保和固定化着）；
- 三、根據它在社會的勞動組織內的作用；
- 四、根據分配給它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規模及所能支配的財產之大小；因而
- 五、形成這一羣人可以掠奪另一羣人的勞動的這樣的人類集團。

以上第一項——社會的生產的體制中的地位，是階級存在的基本出發點。第二項——它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即生產手段的分配），是從第一項派生出來的。第三項——它在社會的勞動組織內的作用（例如在一種階對關係中的命令與服從），第四項，分配給它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規模及所能支配的財產之大小（亦即生產物的分配），又都是從第二項派生出來的。根據以上種種，才有第五項——形成這一羣人可以掠奪另一羣人的勞動的這樣的人類集團（亦即形成社會階級的分裂）。以上五項，不是同等的，同時，又是不可分的。例如除了第一項，社會的生產體制中的地位，是階級存在的基本出發點外，然而社會的生產體制中地位之不同，却又是由第二項它對生產手段關係之不同標誌出來的，

即由生產手段的分配之不同標誌出來的。因此，一方面有一羣人沒有任何生產手段或是基本的生產手段，他方面另一羣人却獨佔一切生產手段或基本的生產手段，這就是階級社會的一大特徵。所以第二項只要不與第一項分開來，它也是很重要的。不過在這裏我們還要重複一遍，階級關係，必然要直接表現在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之中，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雖然仍是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之差別的派生物，然而在階級關係的規定上，它却是本質的特定的條件。沒有這個——抽掉了這個，就無所謂階級敵對與階級矛盾了。

二 科學的階級理論之形成過程

我們把一切似是而非的階級理論批判了，最後才到達正確的科學的階級定義。然而這一正確的科學的階級理論是怎樣形成的呢？它又是一種怎樣的階級理論？我們必須明確指出，這就是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階級理論。那些似是而非的階級理論的特徵，就在於他們都是反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至於這一科學的階級理論之形成過程，可以說就是一種與那些反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理論之鬥爭的過程。

原來自從原始共同體（最好是說氏族制度的社會）崩潰以後，社會就有了階級對立。歷史上一種低級社會向高級社會的推移，就是兩個對立的階級，發生了根本的變動。換言之，就是由於階級鬥爭

把社會推向前了。通常凡是被剝削、被統治的階級，總是代表生產力一方面的，亦即被剝削被統治階級利益，總是與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共同利益相一致的；凡是剝削，統治階級，總是代表生產關係一方面的，亦即剝削，統治階級的利益，總是僅僅對於少數人有利的生產關係之保持，與少數剝削，統治者的個別利益相一致。在鬥爭的過程中，如果剝削，統治階級，壓倒了被剝削，被統治階級代表生產力發展的前進的鬥爭，而繼續維持其於剝削，統治階級有利的生產關係，亦即繼續維持其反動統治，那麼，全社會的生產力就要陷於停滯，破壞，或後退，社會就不能向前發展；反之，如果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打倒了剝削，統治階級，澈底破壞了其於剝削，統治階級有利的生產關係，造成了新的適合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亦即適合於被剝削，被統治階級的經濟結構，那麼，社會生產力就可能往前發展，使全社會得到進步，而被剝削，被統治階級也就獲得解放了，但這只有達到了最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亦即只有造成了最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才能獲得最後的解放，這也就是全人類的解放，階級本身的消滅。所以階級矛盾，原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之體現。由這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轉移到另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即由低級的社會轉移到另一高級的社會，原是階級鬥爭之結果。而階級鬥爭的最後目標是階級一般的消滅。不過消滅階級的階級鬥爭，反而是最劇烈的階級鬥爭，換言之，即階級消滅，不是階級鬥爭的調和，妥協，而是階級鬥爭的劇烈，高漲。拿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鬥爭，正是辯證邏輯之當然邏輯。

馬克斯闡明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是階級敵對之最後的歷史形態，也就是階級鬥爭之最劇烈，最高漲的歷史形態，因而當目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極度緊張時，亦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極度緊張時，尤其是當蘇聯十月革命成功，階級鬥爭，一方面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另一方面以野蠻無人性的法西斯統治方式出現時，儘管剝削統治階級，想一口咬定社會沒有階級固不可能；反之，想把階級關係說成自然的秩序，把他們的剝削、統治合理化，永久化，也是不可能的。然則階級理論之史的發展以及馬、列怎樣和反馬、列主義的階級理論在鬥爭的過程中，完成其階級理論的最後結論的呢？試簡述如下。

在過去和現在，都還有人死硬的這麼說：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是馬克斯創造的。這等於中國的反動派說中國的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創造的一樣。實際上在馬克斯以前，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就已經確實的承認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了。這很顯明的是在法國王政復古時代（從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倒台之翌年至一八三〇年布爾班（Bourbon）王朝的沒落），就有許多歷史家，例如基佐（Guizot 1787-1874）柴厘（Thierry 1795-1855）米涅（Mignet 1796-1874）等人，曾把法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聖·西門認為近代史就是『生產階級』反對封建階級的鬥爭史的這個見解，明確的展開過。不過聖·西門所謂『生產階級』，是把資產階級，勞動者，農民都包括在內的一個階級，他沒有搞清楚他所說的『生產階級』內部還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妄想以『生產階級的支配來代替那種『有階級

級」(即貴族，官僚等封建階級)的支配，當然這還不是馬列主義之科學的階級意義。然而他指出社會在有階級與階級鬥爭這一點，則不可否認。所以馬克斯會很坦白的寫信給他的朋友威德麥依爾(Waldmeyer)說：「對我來說，那發現近代社會中階級的功績，或發現他們相互鬥爭的功績，都不是我的。資產階級歷史家們早就在我之前敘述了這個鬥爭的歷史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們則敘述了各階級的經濟的解剖。我的新的作爲，是在於證明下面的事情。那就是證明：一，階級的存在，只是跟那生產發展所固有的一定歷史鬥爭形態相結合着的；二，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要導於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只是創造一個絕無餘地再向社會階級分裂的社會秩序的過渡。」

從這些話裏面，就可以清楚的看出馬克斯在處理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的理論上和其他資產階級學者的差別及其特點。申言之，發現階級及階級鬥爭，並不是馬克斯的功績，他的功績，在於他把階級及階級鬥爭把握爲一個歷史的過渡現象，而且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之嚴密的科學的分析，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階級對立之最後的歷史形態。這個階級對立之最後的歷史形態，將要怎樣被解決，在什麼形式之下被解決，無產階級在這一歷史形態上負有怎樣的重大的歷史任務。因此，就建立了一個跟一切資產階級學者的階級理論根本不同的科學理論。而且這一科學的階級理論的正確性，真實性，正爲歷史本身的發展一一所證實着。

階級的科學理論建立後，並不是就沒有異說了。反馬克斯主義的階級理論仍然不斷的被階級鬥爭

所反映着。第一，就有抽掉階級關係來觀察社會過程的機械的客觀主義。他們說社會發展有其必然的客觀法則，用不着人力去推動，人力也無法改變客觀條件，因此，在社會發展的必然的客觀法則之中，階級鬥爭對於它是無用的。這等於從根本上否認階級及階級鬥爭。第二，就有輕視，甚至反對階級鬥爭之政治意義的經濟主義。他們說有了日常的經濟鬥爭，就可以代替政治鬥爭，把一切鬥爭限制在經濟領域以內。只從經濟鬥爭來爭取解放工人階級的勝利，這是拿經濟鬥爭來否定階級鬥爭，第三，就有企圖把無產階級運動萎縮到資產階級安全範圍以內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的階級鬥爭概念，雖然也承認政治領域的鬥爭，但却不願把階級突入於政治領域中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拿割了勢的政治鬥爭來否定階級鬥爭。這都是反馬克斯主義的階級理論。因此，對於這些傾向之糾正，是刻不容緩的。列寧就起來擔負了這一任務。

列寧不僅一一糾正了這些階級理論之錯誤傾向，而且對於馬克斯階級理論之本質的理解及進一步的具體化的發展，給與了最可寶貴的貢獻。

我們在前面說過，階級鬥爭是向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展開的。但只有政治鬥爭是最重要的。經濟鬥爭，文化鬥爭，都應服從與服務於政治鬥爭。列寧就根據這種見解來批判了以上所說的機械的客觀主義，輕視階級鬥爭之政治意義的經濟主義，企圖把無產階級運動萎縮到資產階級安全範圍以內的自由主義等等。他說：「經濟主義者，在階級鬥爭中，只承認那種由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見解看

來，是可將就的東西，他拒絕越過自由主義者，拒絕承認那種對自由主義所不能接受的更高級的階級鬥爭。經濟主義者，因此便轉化爲自由主義的勞動政策家了。……自由主義者在政治領域裏，也在想承認階級鬥爭，然而他可要附帶一個條件，那就是不要突入政權的結構上去」（見所著『階級鬥爭的自由主義的概念與馬克斯主義的概念』）。但他斷定：『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張到無產階級勝利的人，才是馬克斯主義者。』

馬克斯的階級理論，實際上由列甫更加展開了具體化了的階級理論，對於理解資本主義社會死滅過程的法則，尤其是對理解所謂過渡期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則，是極頂重要的。因而凡是不能達到這樣水準的階級理論，都是不能拿來理解現代所經驗着的歷史過程法則的。所以那些客觀主義，經濟主義，自由主義的階級觀念，它在理論基礎上是彼此一脈相通的，它在實踐上，都是企圖避免真正符合於客觀歷史發展運動的改變世界的階級鬥爭。只有把人在社會過程中之能动性，把階級鬥爭作爲歷史發展的動力，把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作爲解決最後的敵對的歷史形態的過程，來把握階級及階級鬥爭之客觀存在的意義，才是馬列主義的階級觀。

所以一切反馬列主義的階級觀的特徵是這樣的，即是：他們都想從階級關係中抽掉剝削與被剝削關係，都想拋棄或迴避階級鬥爭之不可調和性，並且都不想將階級鬥爭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引到最後消滅階級。只有馬列主義的階級觀和階級鬥爭理論，才給了這種可能性：解剖剝削與被剝削的真

正根源，強調階級鬥爭之不可調和性，把它作爲改造社會，變革世界，最後消滅階級的途徑和手段。

這裏有着經過歷史檢驗了的兩種階級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策略。過去的第二國際的紳士們及現在社會主義政黨，亦即法國社會黨，英國工黨的右翼政客們，提供了第一種，他們引導無產階級，沿着以否定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爲基礎的道路前進，引導無產階級，沿着以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及經由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議會政治，從資本主義自然生長出社會主義爲基礎的道路前進。這種道路是背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保衛資本主義和剝削關係的道路，這種階級和平調和的道路與政策，無異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幫助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過去第三國際及現在各國的共產黨，提供了第二種道路，這是以馬列主義的階級理論爲根據，對那些歪曲理論及資產階級的影響進行鬥爭，馬列主義的階級理論，曾武裝了俄國的無產階級及他們領導下的農民，撲滅了世界的反動支柱，沙皇專制，並資產階級政權，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此後還在蘇聯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制，及資產階級；消滅了蘇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間的根本差異；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把蘇聯變成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及一切民族解放運動，民主革命運動不可攻破的堡壘和根據地，這種階級鬥爭不容妥協調和的道路與政策，將是指導一切革命階級革命運動獲得最後勝利的唯一武器。

三 階級的起源

我們前說階級是在生產力一定的發展水準上才發生的，這不是主觀的懸揣，而是爲實證的研究所證明了的事實。恩格斯曾指示出階級起源的兩條道路，他說：

「人類原是一從狹義的動物界出來就踏入於歷史中的。但那時他還是半動物的，粗野的，對自然還是無力的，對自己自身的力還是無知的。因此，他跟動物是同樣的貧弱，幾乎是跟動物同樣的不生產的。在那裏，某種生產狀態的不平等在支配着，家族的長者們的地位也是一種平等的——至少社會的階級是不存在的。這種狀態在後期文化民族的原始農業共同體上面還存留着。在一切這樣的共同體上面，最初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這利益的保衛，縱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但却不能不委之於個人。這種共同利害，就是解決糾紛，克制每個人的越權行爲，特別是在暑熱地方的河海湖沼的管理，最後便是宗教上的職能。這種職能在一切時代的自然共同體上面，例如德國最古的馬克共產體，乃至今日的印度，是都可以看得到的。這種職能，自然是得到了一定的權力，而它就是國家權力的起源。生產力漸漸的增大了起來，人口的增加，在個個共同體之間，便生出一些共同的或一些對立的利害；而這些共同體（以利害關係爲中心）向着更大的全體成羣時，這裏又引起來一個新的分工——即爲了防衛共同利益並防止對立利益的機關之設置。這個機

關，既是這羣全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那它就已經占有了一個在特殊的場合，對該共同體，甚至是對立的地位。這機關不久因下面這樣的理由，就更加獨立了起來。那就是第一，因為這職能，在這一事物都是自發的來進行的世界上，幾乎當然是要繼續進行的。第二，因為這機關的需要，由於與其他羣的衝突之增加而迫切。」（見所著「反杜林論」）

這樣一來，最初本是社會的公僕，便轉化為一個對社會相對獨立的，而終於是對立的要素了。由許多近親民族所成立的種族的軍師，或那為各種族的地域的統一的民族之長者，就是這樣的。原始社會，當社會的這一定的機關，從社會獨立起來，當階級分化進行起來時，便宣告終結了。

「但是隨這個階級的形成，另一個階級也在同時形成。農耕家族內部的自然發生的分工，在繁榮的一定階段上，便可以將一人或更多的別人的勞動力引入了進來。在從前土地共有已經崩壞的地方那裏，或至少在昔日共同農耕讓位給那種由各個家族來個別耕種的分有地的地方上，是特別這樣的。人類勞動力現在已經發展到能够生產超過自己生計所必要的東西了。那扶養更多勞動力的手段發生了，運用這些勞動力的那樣手段也存在着。勞動力獲得一種價值。但是共同體自身，或它所屬的團體，都不會提供多餘的可以運用的勞動力；反之，戰爭倒提供了這種勞動力，戰爭却跟許多共同體的並立是同樣悠久的東西。在這以前，人們不知怎樣來處置戰爭的俘虜，因之，俘虜只是被處死或在更初期就被吃了。然而到了現在的「經濟狀態」的階段上，奴隸已取得了

一個價值。於是人們便活着留下俘虜，驅使他來爲自己勞動。如此，武力不但不支配經濟狀態，反而硬要它向經濟狀態服從。奴隸制便被發生了。」（同前引）

這裏我們應該十分注意：不是戰爭造出了奴隸制，而是那種發展到使奴隸制成了可能，且使之成爲必然的生產力，規定了這俘虜向奴隸的轉化。武力決不能從其自身造出新的生產關係；它只不過是當新的生產關係的可能性存在着的時候，作爲其實現的媒介因素，來充新生產關係的助產婆而已。奴隸的發生，是生產本身發展的結果。在剩餘勞動不可能的那樣幼稚生產階級上，戰爭的俘虜決不會被利用作奴隸的。再則隨共同體內部的貧富之日趨懸殊與高利貸事業之發生，債務奴隸也發生了。

以上是恩格斯所說階級發生的兩條道路：一是着着社會職能的執行機關之從全社會獨立而來的那種階級分化的道路；一是隨着使奴隸制成爲可能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規定了俘虜向奴隸轉化而來的那種階級分化的道路。兩者要不外都是生產發展的結果。這兩條道路，好像可以這樣說：前者產生了國家；後者產生了階級。而實則國家決不能是外於階級的東西，因而隨着社會職能的執行機關之從全社會獨立而來的那種階級分化，也決不能是外於隨着使奴隸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爲可能，規定俘虜向奴隸轉化而來的那種階級分化的東西。這就是說氏族制度崩潰以後，第一次出現的古代社會國家，決不能外於奴隸制。古代國家乃是以奴隸爲基礎而建立的。也就是說古代奴隸社會的國家，根本就是建築在奴隸那種剝削的階級制度之上的；因而那時的國家的統治者，就是奴隸所有者。所以恩格

斯對於國家成立的根源，曾經這樣說：「然而如果那對富的慾望，還不會使氏族成員分裂爲富者與貧者；如果同一氏族內的財產的差別，還沒有使利害的一致轉化爲氏族員的敵對；而且如果生計之獲取，還沒有因奴隸制的擴大，想到那只是奴隸們來幹的活動，且是比掠奪還可恥的話，則這件事（指國家之成立——筆者）就斷乎是不可能的。」（見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

如果我們把以上所說歸納起來，也許可以就是很簡單的如下幾點：一，剩餘生產品的發生，是階級發生的一個主要條件；二，生產手段和生產資料上的私有財產之發生，是階級發生的一個更接近的條件；三，社會職能的執行機關之從全社會獨立，是階級發生的初步結果；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奴隸制成爲可能，使奴隸社會代替原始共產社會，是階級發生之更加具體化、明朗化的結果。總之，在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分工，剩餘生產品的出現，及私有財產發生的經濟基礎上，才發生了階級，國家，剝削，統治等等東西，國家是剝削統治階級制馭被剝削，被統治階級的工具。

四 階級關係的歷史性

我們曾經說過：「階級是一個歷史的範疇」，這意思就是說階級是歷史的產物，它是隨同歷史的變化變化的。例如古代社會的基本階級，是奴隸和奴主，封建社會的基本階級，是農民和領主（地主），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各種階級的利害差別隨着歷史的變化，表

現在各種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差別中。一切剝削，在獲得剩餘生產物的這一點上雖然是一樣的，然而其歷史形態，在種種社會經濟結構上却有不同。例如在古代奴隸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奴主對於奴隸剝削的形態，是連奴隸的人格都不承認的連勞動力的再生產都不願到的一種強制勞動的剝削，其特徵是佔有整個的奴隸勞動，連奴隸的生命都佔有着。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剩餘勞動的剝削，則採取地租的形態。例如勞動地租，現物地租，貨幣地租等等。最典型的農奴制，亦即封建制，則是在徭役勞動的形態上來剝削的勞動地租，這種地租的前提，是農民人身的直接的隸屬於地主，且又使其隸屬永續着。不過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之中，縱使在勞動地租的場合，一部分農民，也可以由強化自己私有地上的勞動或延長勞動日等方法，來獲取微少的積蓄，這在現物地租，或貨幣地租之下，就更有可能。這是它與奴隸制剝削不同的特徵。但這只是一部分的農民，它的反面是其他的農民，因此更加貧困，於是農民階級內部就不免發生分化；分化為富農、中農、貧農、佃農、僱農等等。但這種分化自然還是受封建農奴制的限制的。等到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向農業的侵入，便更加促進了農民階級的分化，在資本主義化農業澈底成就的時候，農村中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租地農業資本家，和領受農業資本家一部分剩餘價值作為地租的地主，而農業勞動者，即農村的無產階級也發生了。在封建地租之中最後出現的，是貨幣地租。因為貨幣地租，是以貨幣普遍流通，商品生產一定發展的程度為前提的，等到商品生產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使得人類勞動力也變成商品的時候，工資勞動者，就這

樣產生了，封建制就要讓位於資本制。剩餘勞動就以剩餘價值的形態來被剝削。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之中，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對於資本家，是以自由人格間的契約形式來表現其相互的關係的。因而在形式上，或者說在法律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不平等的，這是它不同於奴隸制與封建制的特徵，然而在實質上，經濟上的不平等，決不能為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所掩蓋。反而有一點，值得特別提出來，即資本制的階級剝削，不需經濟以外的強制，即不需使用超經濟的剝削方法。因而它的階級特權，不必藉法律的形式來確定，藉所謂特殊身分（等級）來維持。奴隸制或封建制之下的階級剝削，却是一種超經濟的剝削，即是一種經濟以外的公然劫奪，所以非要國家賦與以法律上的公然劫奪的特權或特殊身份不可，例如賜封以公侯伯子男等五等爵位，賜封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食邑，使其安然坐享，被剝削者亦以為分所宜爾，因而在那裏階級便表現為身分（等級）。所謂身分者，並不是外於階級的東西，它是以法律賦與的特權來保障其對於被剝削者公然劫奪的階級。所以身份是封建的遺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係上已用不着它了，但這決不能說資本制的階級關係不是剝削關係，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就意味着經濟上，實質上的平等。

由於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同，不僅階級關係，剝削關係不同，而且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下，被剝削，被統治階級的命運，也各有不同。任何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毫無疑問的，都是同任何剝削，統治階級戰鬥過的。對於新的較高級的社會制度的創造，當然也都盡過很多的力量。我們在前面曾說

過，一般在生產過程中被剝削，被統治的階級，都是代表着生產力的一方面，決心打破那生產力的桎梏的生產關係的戰鬥的革命階級，但因爲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不同，在歷史上可能完成的歷史使命也不同。甚至每一歷史變革所給與他們的命運，也各有不同。我們如果具體的來考察一下，奴隸會爲打破奴隸制而叛變，農民也會爲打破封建制而暴動。但其結果，他們都不會把自己變爲新社會的統治者。近代工資勞動者則不然，他們打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果，就能創立社會主義社會，就能在其過渡期建立自己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由於什麼原故呢？這完全由封建制的農業生產在奴隸制的結構中，資本制的商品生產在封建制的結構中，都是自發的生長出來的，而奴隸和農民對於其統治剝削者的反抗，還不能有任何政治的自覺，所以奴隸，或農民，都沒有成爲那發生在舊的經濟結構中的新生產制，新社會制度的統治者。反之，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決不會在資本主義胎內長出來，資產階級決不會是異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創造者。而創造異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新的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的人，一定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又是充分有了階級自覺的階級。因此，資本主義的崩潰，與共產主義的建立，在其過程與動力方面，不能不採取異於奴隸制，封建制之新陳代謝的獨有的歷史形態，無產階級的命運和任務，也就顯然和奴隸，農民兩階級不同了。

五 階級和階級鬥爭之具體的歷史過程

階級關係的歷史性，顯示出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階級結構及其鬥爭亦各有其不同的歷史形態，我們在這裏有把它的具體的歷史過程，加以敘述一番之必要。

第一，我們來具體的考察一下奴隸社會（第一個階級社會）的階級和其階級鬥爭。奴隸社會較之其先行的原始共產社會，毫無疑義的是前進了一步，這從生產本身的發展來說及其把俘虜的生命留下來，使其向奴隸轉化來說，都是如此，然而奴隸社會所有經濟、文化方面的進步，都是以強烈剝削奴隸為代價而獲取的。當奴隸社會的經濟還沒有脫出自然經濟的時候，奴主對於奴隸的剝削，至少還受着經濟需要的限制，一旦到了自然經濟逐漸向商業經濟前進時，因而奴隸勞動的主要目的是在獲取交換價值時，奴主對於奴隸的剝削，就必然要達到最高度。奴隸社會的國家，是奴主階級統治奴隸大眾的唯一工具，而奴隸社會的剝削，又是經濟以外的一種公然劫奪。這種國家就在法律上賦與奴主階級以特權和特殊身份來保障這種公然劫奪。這種奴隸制的生產，以後更加引來了前進的廣泛的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分工，引來了交換的發展，引來了貨幣經濟的發達，而且還引來了特殊商人階級的對立，並加強了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為奴主造出了窮奢極欲的可能性，奴主為滿足其窮奢極欲的特殊經濟需要，只有更加強烈的剝削奴隸大眾，這使得奴隸勞動的生產性達到了極限，亦即使奴隸制的生產關係變成了它生產力的桎梏。在這以前，奴隸制的生產關係，是曾經服務於其生產力的發展的，然而現在不可能了。尤其因為奴隸勞動，曾經促進了羅馬奴隸所有者的大地產制，這種大地產制上的奴隸勞動

，由於強烈剝削之勞動性的絕望而自殺，在今天也變成沒有前途的了。於是聰明的奴主，就懂得把大地產制分成一塊一塊的小的分地，分給農奴、貧民、移民耕種而收取其勞動地租。這樣，便在奴隸社會的內部，提供了對於封建制度轉化的前提。恩格斯曾說過：『小的農場重新作成了便於贖讓的形式。大田莊接二連三的分成了小的分地。……這些小的分地……首要是讓給移民（從外移殖到羅馬來的人民——筆者），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額，他們附着於土地了；並且能够把他們連同分地出賣。……他們是中世紀農奴的老前輩。』（見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但這一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究竟不是自發的，自然生長出來的。這是一個鬥爭的結果。奴隸階級向奴主階級鬥爭的結果，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西曆紀元前二世紀，有過西西里島的奴隸起義，西曆紀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有過斯巴達領導的奴隸軍的起義，這當然要加重奴隸制經濟的動搖性，然而最初幾次奴隸的起義，都被奴主階級的國家軍隊擊潰了。但奴隸反抗奴主的鬥爭，並沒有因此而停歇，而且繼續的在往前高漲。這種高漲的奴隸反抗運動，逐漸獲得了廣大的小生產階層的支持，亦即所謂自由民的支持。這些小生產者的自由民，也是親身受奴隸制的壓迫的，他們可以說都是敗於跟奴隸經濟的競爭而沒落的階層。最後，奴隸起義還得到了城市和鄉村中的窮人的支持，同時，由於和日耳曼野蠻種族的侵入結合在一起，四分五裂的羅馬帝國就倒下去了。奴隸社會制度，就是這樣告終的。斯大林曾說過：『奴隸的革命（亦即奴隸社會的階級鬥爭——筆者），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

消奴隸所有者對勞動者的剝削形態。」（見所著『列寧主義問題』）奴隸本身不可能成爲新的，更高的生產制度的担当者。但他們的革命實踐，他們的鬥爭，却對於社會發展的下一階級掃清了道路。

第二，我們再來具體的攷察一下封建社會的階級和其階級鬥爭。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起來代替了奴隸經濟。封建社會是在領主（地主）對於從屬他們的農奴的階級剝削上建立起來的。封建制最早的剝削形態，是勞動地租，即農奴在一星期中要有幾天在封建領主的土地上，替封建領主作工。這種剝削形態，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飾的剝削形態，也就是一種超經濟的剝削，爲使這種剝削成爲可能，即需要使農奴附着於土地，並在身份上隸屬於地主。這種附着與隸屬，是封建國家——領主壓迫農奴的工具——以法律的特權，政治的強制，來爲它保障的，封建領主及中世紀的僧侶們，在法律上享有種種的特權，構成封建社會最高的等級（特殊的身份）。因此，封建社會也就跟奴隸社會一樣，其各種階級，也就是特殊的等級。這也就是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階級，都是『等級的階級』，亦即明目張胆以法律和國家政權來保障其剝削特權的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特權，便不需用法律規定）。

封建剝削，逐步轉變爲現物地租，貨幣地租，以前的自然經濟，也由其內部的發展遭受了損害。現物地租代替勞動地租，貨幣地租又起來代替現物地租，正是自然經濟逐步崩潰的表現。貨幣地租的剝削形態，也逐步接近於農村中的新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形態。這樣，封建社會也就要讓位於資本主義社會了。

然而這也不是自流自發的，這也是農奴對領主鬥爭的結果。封建社會的階級和其階級鬥爭，主要就是農奴階級對領主階級的鬥爭。在封建剝削下，陷於絕望的農奴或農民，不斷的暴動起義來反抗領主或地主。但因為農民大眾的農業生產在基本上是細碎的，分離的，帶有地方性的，缺乏組織性的，所以不易獲得決定的勝利，把地主階級推翻後，使自己成爲新生產方式的担当者，和新制度下的統治者。農民的革命力量，需要有人組織的階級來領導。在資產階級的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出來領導農民，篡取農民革命的果實。其目的不是爲的解除農民的剝削，而是用別的剝削形態來代替這種剝削形態。只有當無產階級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農民才能找到可信賴的領導者及其階級戰友。所以斯大林曾說過：「農奴的革命，肅清了農奴所有者，並取消了農奴制的剝削形態，但代替他們的，却是資本家和地主，資本主義和地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態。」（同前引）

第三，我們來具體的攷察一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也就是現代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有更進一步澈底闡明它之必要。任何社會形式，都不可能單純只有一種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之中，顯然還包括有其他副次的生產方式，即有基本的生產方式與其他副次的生產方式之不同，因而也就有基本的階級與其他副次的階級之差別。試把它分述如下：

A 基本的階級

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者對立着，又交互制約着，構成矛盾的統一。然而大家都知道：一般在辯證法上的統一，安定，靜止，只是相對的，而矛盾，鬥爭、運動，却是絕對的。與此同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統一，是相對的，矛盾是絕對的。因此，矛盾總不能在統一的範圍中硬給它安定下來。矛盾的解決，是矛盾向前展開的結果。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中，把這矛盾向前展開的是無產階級；反之，抹殺矛盾，企圖把矛盾在統一的範圍中硬給它安定住的是資產階級。前者是肯定的要素，革命的要素；後者是否定的要素，反動的要素。資產階級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就不能獲得利潤，剝削剩餘價值，因而鞏固執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亦即固執着生產剩餘價值的條件；尤其當無產階級的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反抗資產階級以後，亦即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生產力發展到了愈益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強烈衝突以後，資產階級的保守性，反動性，就愈益明白表現出來了。不過當它還是一個封建剝削，統治的反對派時，它是進步的，即它在歷史的變革中，也有它進步的意義。

資產階級最初在封建制度下，它是都市的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的代表者。它伴隨着商業的發展而成長。在西歐，發達的商業都市，形成了從封建領主獨立起來的自治都市。當封建國家向着資本主義國家推移時，作爲其必然一環的封建王朝和封建領主的鬥爭，資產階級曾經是封建領主的反對派，站在封建王朝方面，成爲這種推移過程上的王朝的支柱。等到封建領主完全沒落，資產階級便成爲那

時惟一的統治階級。以後專制王朝，有的踏上了與封建領主沒落的同樣道路，例如法國的布爾班王朝；有的蜕化爲資本主義王朝，英國是其典型。這時的資產階級，是曾經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

關於資產階級的成長及其政治前進的基礎，乃是產業從小商品生產向工場手工業生產，以及工場手工業生產向大工業生產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過程中，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轉化爲產業資本。產業資本家，從商人之中生長出來。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取得優勢，形成排他地位，即是商人向產業資本家轉化的結果。因此資產階級，在它還是代表發展途徑上的生產力來同封建勢力鬥爭時，它是進步的。商品生產發展的時代，特別是從工場手工業發生以後，到確立資產階級的政治支配時代，亦即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創立的時代，乃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暴風雨般的發展時代，亦即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代，因此，資產階級也就還多少具有過相對的進步性。但這樣的時代，在世界史上，以一八七一年而告終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在這一年中，德國資產階級已對半封建勢力妥協成功，很曲折的成爲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法國在這一年中建立了它的第三共和國，英國資產階級亦於此前後獲取了對貴族、地主的優勢、這樣，它就不可能再向前進了。所以資產階級的進步性，是有它的限界的，這由於他們乃是少數人的有產者，剝削者之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可以說從最初就存在了的，由於他們是有產階級，而且是大所有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性還不能跟雖然是動搖的，但是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相比，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特別中農），都是反對所有的不平等，而採取

一種平等主義的傾向的。這傾向不僅表現為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思想而且還表現為要求平均財產和均分土地等等思想。但這些思想決不是社會主義的，只是原來資產階級民主之澈底的形式。然而因為它觸到了財產上的特權，到底不能被資產階級所贊同。所以資產階級決不會把民主革命進行到澈底的。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要求上，工人、農民、城市平民是較之資產階級為急進的。而且只有工人階級才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最積極的領導者。因此，俄國孟塞維克黨人，認為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階段上，革命的領導權要屬於資產階級的見解，是不正確的。所以即令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階段，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城市平民之間的要求和目標也是不一致的。尤其在工人階級以革命的姿態出現於資產階級的面前時，其不一致性更加明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性的表現，即是它們所標榜的自由主義，而它們所謂自由，即是貿易的自由，從實質上來說，是不澈底的，反動的。因而在某種情況下，他們往往反過頭來和封建勢力妥協。

馬克斯，恩格斯會痛切的指摘過：一八四八年，德國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叛賣人民和專制主義妥協的事；列寧也暴露了自由主義者在俄國民主革命階段上是極卑鄙的，反對和他們提攜的少數派，固執和農民主義的結合。這樣，自由主義者就在那無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身利害以進行獨自鬥爭的時代，例如當十六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時，就已經露出了它的界限。馬克斯，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時代的封建領主的反對派之中，分別指出路德的騎士反

對派和米紐恩采爾（Munzer）的平民反對派，揭示前者的妥協叛變性質，後者首尾一貫的急進民主，這是很恰當的。因為路德就是當時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恩格斯還提出：英國十七世紀中葉克林威爾建設共和國時，是農民（特別中農）提供了那個運動的力量。他說：『無論如何，只有中農和都市平民的參加……紛爭才能作最後的解決。』（見所著『從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序言）列寧又指出：『法國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已經在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九年革命中，就露出了對徹底的民主的敵意……而以無產階級為先鋒的法國民主』，則對抗了『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動搖、叛變、和反動的態度，在不只一次的困難結合之後，建設了共和國』。法國大革命時的甲可賓（Jacobin）黨，雖是小資產階級黨，但它却原是依據激昂的無產階級的黨派。

根據以上事實，資產階級較徹底的民主之實現，並不是由資產階級，而是由都市平民（主要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來成就的。這種民主之實現，自然就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物（封建半封建因素），因此，結果無異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了。所以恩格斯曾指出：『當時可以收穫的成熟了的果實竟由資產階級收去了。革命顯然需要走過目的以上，法國一七九三年，德國一八四八年的情形，正都是如此，這實際可以看作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法則之一。』（見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序言）恩格斯這樣清楚規定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法則』之認識，後來就成為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都市的平民要素』（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提攜，即『左派集團的戰術』。所以資產階級的革命性，

開始就是有界限的，無產階級愈成長，這界限就愈表現得明白。一八七一年的法國，更充分表現了法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反動性，資產階級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一般危機爆發的時代便失了它一切的進步性。法西斯主義的出現，他們就明目張胆的連自由主義的旗幟都不要了。

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統一的階級，這是沒有疑問的，但不可不注意其本身也有若干利害不同的派別，尤其是在不可能揚棄的那種自由競爭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其內部的競爭、傾軋更甚。所以在經濟上不斷反映出來的相異的資本家集團之間的競爭，例如托拉斯間的競爭，托拉斯和托拉斯以外的資本家集團間的競爭。這都是他們派別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不過這種不一致，一臨到無階級革命起來時，就通通消滅了。

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全面畫像。然則無產階級呢？試申述如下：

無產階級，原是從那些離開鄉村的農民，那些崩潰了的中世紀的行會中的工人或徒弟，那些零落了的小商人或手工業者等等生長出來的，所謂『前期無產階級』，就是以上那些社會的成份。所以最初的無產階級，就是那些分散生活在小商品生產中的資本勞動者，從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到大工業的生產的時代，他們就愈來愈集中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生存同時開始的。『最初各個工人，然後一個工廠的工人，然後一個地方同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向着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各個有產者作鬥爭。』（見共產黨宣言）然而在這個時候，他們的團結並不很好，即在政治上還沒有充分的

自覺。其鬥爭僅是限於經濟的，沒有無產階級明確的政治目標和目的意識，但到了產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的人數日益增加，且日益密集在同一作坊或地域內，同時在他們之間過去因技能之差別所引起的待遇之差別，也因生產過程日益機械化而減少，他們的生活日益惡化，革命的客觀條件日益成熟，他們的革命運動就一天比一天有力了，這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同時就是無產階級的成長。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僅反對他們自己的敵人，同時也反對他們敵人的敵人，換言之，他們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也是最根本的動力。他們在反對封建勢力以使資產階級地位更加確定這一點上，並不是把無產階級的地位降低，即使無產階級降於不利地位，這反而是使他們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導入於必然勝利的條件。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矛盾存在着的時代，雖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但如果封建勢力的殘餘還很嚴重，民主革命尚未進行到底，這時無產階級積極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是對於無產階級有利的。

在無產階級的鬥爭還沒有超出經濟鬥爭的範圍，因而其一切鬥爭都還是出於自發自流性的時候，從客觀上看起來，他們雖然已是一個階級，但在主觀上，他們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到自己的特殊利害，這時，無產階級，還只是『自在的階級』。例如十九世紀初的英國工人階級，或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俄國工人階級，就是這樣的。等到無產階級鬥爭，從自發自流性進到了目的意識性，即在主觀上明確的意識到本階級的特殊利害，要為解除本階級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來變革整個資本主義

的生產制，這時就出『自在的階級』進到『自爲的階級』了。但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却只能從外面輸入，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真正自爲的政治意識，必需有科學的社會主義爲之開路，否則就只能萌長出一些工聯主義，經濟主義的思想。然而科學的社會主義，則是從資產階級中受過教育的代表——知識界所研究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各種理論中生長出來的。無產階級只有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相結合，才能有真正自爲的政治意識和政治運動。不過對於這一問題，應當有下面三點的補充說明：一，科學的社會主義，固然是從知識界所研究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各種理論中生長出來，可是它的生長與發展，是需要根據唯物的社會發展規律之認識的，並且是需要和工人運動的發展和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進到自爲的階級的過程，密切聯系起來的。沒有唯物的社會發展規律之認識，不和工人運動相聯系，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不能形成與發展起來的。第二，某些知識份子，雖然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但他們領會了接受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且爲此而堅決鬥爭的時候，他們已脫離了原來的階級立場，已不復是資產階級分子，而是無產階級化的革命戰士了。第三，無產階級分子，也不是絕對不能參加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造與發展，不過到他們來參加時，他們已不是以工人的資格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的資格來參加的。就是說只當他們多少已經能夠具有自己所需的那個時代的知識，而且能夠把這種知識推往前進的時候，他們才能參加這種創造。在無產階級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相結合，無產階級接受並擁護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無產階級的政黨，就不可免要產生與發

展起來。這一個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隊伍，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與廣大羣衆之聯繫的體現。無產階級的政黨，爲着無產階級，廣大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而鬥爭，它領導着無產階級，領導着廣大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以及文化鬥爭。它清楚認識社會發展的一般的規律性與各國民族的特點，根據了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與民族的特點，具體領導革命鬥爭，經過那些必需經過的階段，以至最後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使命。

無產階級從自在的階級轉化爲自爲的階級，從大體上說來，其經濟條件是產業革命，或者說是在產業革命過程中生長起來的。他們一旦獲得了真正自覺的政治意識，其團結便十分堅固，其陣營便十分齊整。他們不像封建制下的農民在某種條件下，雖然作爲一個完整的階級與地主對立，但逐漸就分化爲富農、中農、貧農、僱農種種階層，也不像資產階級內部有種種派別。無產階級，可以說無論在企業內或企業間，無論在國家內或國家間，都沒有任何利害的不一致，因之其結合較之歷史上任何階級都爲廣泛而堅強。這種結合當然是爲資產階級所不容的。尤其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條件已經成熟的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爲維持其剝削統治地位，只有獸性般的來鎮壓一切被剝削，被統治的人民大眾的解放運動。但這種鎮壓手段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強力鎮壓工人階級，另一方面又畜養工人貴族，及工會官僚，並在意識上企圖灌輸無產階級以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列寧說：『那意味着少數最富裕的國

家的獨佔的高額利潤的帝國主義，產生出懷柔上層無產階級的經濟的可能性，且藉以畜養，製造並強化機會主義。」（見所著『帝國主義論』一書）一部份的熟練工人就以這種上層的資格來參加那從殖民地及附庸國剝削的超額利潤中的一小部份的分配。許多工會官僚就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他們就是資產階級政權及其勞動政策之公然的或隱蔽的支柱，這最典型的例子是憲章黨運動死滅以後的英國。

二次大戰前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就是這種工人貴族、資產階級政權及其勞動政策的主要支持者，所以有人把他們叫做社會法西斯蒂，這是一點也不過當的。但這種現象之發生也並非偶然。因為如果在無產階級內部絕對沒有容納這種現象的空隙，資產階級及上層的工人貴族就再努力想把非無產階級的方針，觀念注射到無產階級身上，也是不會有效的。實際上，無產階級本身原已存在着那種媒介資產階級影響的成份。因為嚴格的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並不是兩個機械的可以切開來的各自住在另外一個世界的生物種屬。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使許多從自由競爭那裏敗下來的小經營者趨於資產階級化，而同時還不斷製造出新的小經營者，例如担任那些附屬於大工業各個部分的小經營及資本主義的家內勞動等等。而這些小經營者（小資產者）也同樣不可避免的要再投入於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的。因此，列寧說：『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漸漸浸入廣泛的勞動者部隊中，完全是當然的事。』（見所著『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一書）所以小資產階級不斷進入於無產階級中一事，正是馬克斯修正主義者的發生和繼續的階級根源。這些小資產階級的要害，隨着勞動運動廣泛的展開，也就愈來愈被

吸收在運動中。因此，在他們未拋棄或克服其小資產階級意識以前，自然不可避免的就要作修正主義的媒介體，但另一方面，許多小資產階級却是可以轉化為無產階級，而給勞動運動增加生力軍的。

不過，一切的科學理論，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客觀的現實，便不會被人當作真理來接受，而且也不會有科學的形式。因此，就是那向無產階級注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影響的修正主義，也應該是以某種方式在反映客觀現實的東西。我們已經看到哲學上的觀念論，是那把認識的一個契機加以絕對化之故。即在理論上片面的固執各個現象而把他們加以誇張和絕對化。那麼，如果我們把修正主義在認識論上來加以考察的話，那它也正是基於誇張和吹噓那充滿了矛盾的極曲折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某一要素，某一側面而來的。例如我們如果絕對的去看社會發展的繼續性和漸次性的契機而忘掉社會革命的必然飛躍，就不可避免的要結論出康德派社會主義或伯因斯坦主義，乃至晚年的考茨基主義之類的東西來的。考茨基大家都知道他會有意識的服膺過馬克斯主義，甚至對修正主義還作過一些批判。然而因為他是在社會漸次發展的時代長大的。所以他就把只適應這種發展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戰術，絕對的看起來了。認爲此外都是非馬克斯主義的。這樣一來碰到社會飛躍發展的過程，例如一九一四年以來的社會發展，便終於不能採取正確的革命態度，把這種理論完全變成資產階級御用的理論了。反之，如果有人絕對的去看社會發展過程的飛躍契機，又會發生從左面來的修正主義，例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等。從左邊來的修正主義，仍然只是資產階級影響的表現。同樣是被焦燥

所驅使的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他們因爲輕視對資產階級之較灰色的日常鬥爭，同樣妨害了革命的展開。

如上所說，雖然在無產階級領域內也存在着一些對無產階級起解體作用的要素，但無產階級作爲其「自爲的階級」的資格，却也在日益強固着。原來資產階級也正是爲了無產階級的日益強大，才需要畜養工人貴族及所謂修正主義者的。不過我們要深切知道：無論如何，階級是不犯錯誤的。整個無產階級是不能甘心委身於資產階級的剝削統治的，爲了把整個無產階級所本能的曲折革命路程和他的前途，加以理論的闡明，以便使那些無謂的挫折或錯誤盡量減少，並解脫和縮短其革命勝利過程，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及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十分必要的。

B 副次的階級

資本主義的基本的階級對立，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然而任何社會形式，都是不單純的，因而其階級構成也不單純。除了基本的階級對立外，還有副次的階級。例如地主階級，在封建制度下，它是跟農民階級構成基本的對立，而且成爲唯一的統治階級成爲一種特權身份。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地主已經不再是什麼具有特權的身份，它變爲從屬於資產階級的一個副次的階級，也構成統治的一部份。這時，隨着農業資本主義化的程度不同，地主從屬於資產階級的程度也不同。

不管社會形式，是否已由封建社會上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是在農業資本主義化着的地方，

地主就要從資本主義的農業家那裏，領受剩餘價值的一部份作為地租，這時，地主就失去其為階級的獨立性。他不是變成資本主義的農業家的寄食者，變成資產階級的寄生虫，就要直接成為農業經營者。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主（即領受剩餘價值的一部份作為地租的地主）和資本主義的農業家，即農業資本家之間，雖為了把剩餘價值轉化為地租的那一部份的多少問題，和農業生產物的價格的貴賤問題而顯現出彼此間利害的衝突。但因爲這時地主已不能不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爲他的生活條件，所以其衝突對立，決沒有觸到資本主義存廢的根本問題。因此，在無產階級逐漸抬頭，並有力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制時，地主跟資本家的結合是異常強固的。在封建統治並未受損害，而封建地主開始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地主的場合，封建的統治階級是這樣來應付這一局面的。即，一面保持其統治階級的優勢；一面把資產階級編進統治階級的構成員之中。並不是讓資產階級來清算封建的土地所有，即資本主義的地主，也不是作為資產階級的派生物生長出來的。因此，這時地主跟資本家的結合，反而是地主佔優勢。在整個經濟領域中，這時雖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壓倒的，但在政治上却還不免殘存着半封建的因素。在那裏，資產階級反而受着地主氣味的教育，過去的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此外，還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佔優勢的社會中，却有不少地主還依據着封建的農業關係而生存的那種國家。在這種國家中，而臨着無產階級的抬頭，資產階級對封建的農業關係的清算，不但已經沒有好處，而且爲了共同對付無產階級反而非跟地主結合不可了。而地主呢？也因爲他是地主，爲了對

付農民，就非跟資產階級結合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封建的農業關係反成爲資本主義的存在不可缺的條件，因此，在政治上也就不能不殘留着許多封建因素。不容懷疑，在那裏整個經濟領域已是資本主義的因素佔優勢，地主已成爲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者，工業經營者，乃至利息生活者，封建的農業之中也侵入了資本主義的因素。然而因爲封建的農業關係在那裏正是助長資本主義生產的契機，於是維持這種關係便以一個『定言命令』被要求着。同時在政治的分野上，封建勢力也就因之非常的大。過去的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

總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地主已成爲從屬於資產階級的一個副次的階級，同時，也是一個最卑鄙的階級。

在資本主義社會，除了地主這一副次的階級以外，還有小資產階級。所謂小資產階級，就是指的那些小商品生產者的階級。而在鄉村裏面，則是農民，特別是中農。

資本主義社會，原是從小商品生產生長出來的，但它又於其成長後，一面使小商品生產，小經營沒落；另一面再把小商品生產，小經營當作自己的附屬品而產生出來。這種小商品生產的階級，亦即小資產階級，他在資本主義生產制下，是要不可避免的走到兩極分化，即一面不斷的向無產階級分化，而另一小部份則向着資產階級方面爬行。因此，他在經濟領域中是飄浮的；他在政治關係上，也不能堅立堅定的不動搖的目標，因而就不能獨立的鬥爭着。他總是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爲

兩者的爭取對象。在資本主義勃興前，產業革命開始以前，小資產階級在都市中佔過人口的多數，起過重要的作用，不久就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下層馬上就滾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去了。就因為這個原因，他和工人，窮人，浮浪者等一同構成了『都市的平民的要素』（前期無產階級）。他們在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的法國，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都盡了不少的進步任務，特別在法國那為甲可賓黨所代表的都市小資產階級，曾援助過農民和一般『都市的平民的要素』。小資產階級，因為他是小商品生產者，小經營者之故，他是反對那商品生產發展之桎梏的封建統治的，因為他是小所有者，所以他對上層資產階級抱着反對的氣息，同時，又因為他是小所有者，他究竟跟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不同，還抱着所有者的心理。小資產階級的特別的意識形態，就是那表現在盧梭的平等主義，表現在蒲魯東的平等細分的小所有的理想。因此，小資產階級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在各個場合，他們究竟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抑站在無產階級方面，那是要由這兩個階級的勢力關係和政策來決定的。然而資本主義高度的發展，打破了小資產階級小所有者的幻想，小資產階級獨立性的外觀也在日趨消滅。當他們大多數到了受着沒落威脅的現代，他們對無產階級的同情也就比對資產階級的依附要多得多了。雖然，在現代，仍由於他們小所有者的心理和其政治水準的低下，不免為法西斯所利用。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中典型的小資產階級便是中農，中農隨着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大部分沒落而為半無產階級的貧農，更由貧農而沒落為純粹的農業無產階級；小部分則發了跡，變成資本主

義下的富農。農民在資本主義下，既然要分化爲農業資產階級，富農，（資產階級要素）小資產階級的中農，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和純粹的農業無產階級，它決不構成一個階級。但在農村中如果還殘存着封建關係，那麼，這些分子就都要以農民的資格構成一整個階級。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那反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全體富農是反對的，全體中農則是中立的，全體貧農跟農業無產階級，則是無產階級最親密的戰友。然而在封建社會還在統治一切的時候，這一切份子在清算封建的土地所有這一問題上，必然完全出於一致。因爲農民在封建社會中，跟地主，領主，是基本的階級對立，其內部雖在分化着，其對立雖在日趨成長着，但對封建的階級關係，則是一致反對的。所以清算封建的土地所有，全體農民仍能採取一致的態度。等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崩潰之後，資產階級的要素跟半無產階級的乃至無產階級的要素之間的對立，才開始表現爲農村中基本的對立。在這以前，這種對立對於地主跟農民之間的對立（封建制度的基本對立）來說，就只能是要素的。

在與封建關係的鬥爭中，即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封建制下的基本階級之一的農民，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資產階級，「都市的平民要素」，雖然都要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特別後者還是這個革命中最澈底的成份，然而在產業革命以前，後者還沒有構成人口中的大多數，在那時，在人口中佔最大多數的是農民，因此，農民是否積極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對於這一革命的成敗，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不過農民在封建制下，被那些分散的領主，地主所有地束縛着，所以往往不能統一

起來行動，往往不易覺悟成爲一個「自爲的階級」。因此，他如果不跟資產階級或「前期無產階級」的運動合流，他就不能單獨的獲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列寧指出現代無產階級的革命，「依存於（一）人數，（二）在國內經濟上的作用，（三）與勞苦大眾的結合，（四）其組織性」。（見所著對布哈林轉形期經濟學的評註）封建制下的農民所缺的，就正是這個組織性。所以在與封建階級的鬥爭中，農民常常是受着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和「都市的平民要素」的指導的。然而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當農民的鬥爭超過了他們所許可的範圍時，他們就不是農民的同伴了。不過我們說過農民非跟都市「下層民衆」聯合起來，並且受着它的指導，決不能超過自由主義者而進至民主主義的真正實現。因而在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前，就提出來了這樣一個課題，那就是：無產階級在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潮流中，必需嚴格的區分自由主義的民主和農民的民主，而爲了民主的利益去和農民聯合起來，而且把他領導起來。曾經反對在俄國民主革命中去和自由主義少數派聯合的列寧，就根據這種區分，主張和農民的民主聯合，並把它從自由主義之中嚴格的分別出來，只把那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爲基礎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才叫做民主，自由主義的民主，雖然也是民主，然而因爲他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是不澈底的，欺騙的，與真正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並不符合。因此，當我們科學的研究歷史時，乃至實踐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中，把自由主義的民主和農民階層的民主這兩個潮流加以區別，像恩格斯對十六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所作的一樣。

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如果農村還殘留着封建關係，縱使農民內部業已進行着階級的分化，但對於殘餘的封建關係來說，農民階級還是整個的，即仍然有着共同的利害。爲了民主的利益，他和無產階級結合，不待說在這裏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因爲在資本制下，農民隨着資產階級民主的實現，隨封建關係之肅清，就顯出向農業資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分解的傾向。而且因爲無產階級，總是要走向民主制度以上的，所以那已經實現了的資本主義的民主，也要因爲資本主義已臨到其垂死階段的帝國主義，其民主的進步性也絕不能保持，甚至連其民主的外貌也要取消。

C 知識分子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基本對立以及副次的殘餘的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外，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發現一羣智力勞動的人們，即所謂知識分子羣，資本主義特別有力的發展了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創造了專門或近於專門從事智力勞動的一羣特別的人。有人把知識分子羣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或一個社會階層，實際上是不妥當的，因爲很多知識分子是各異其在生產體制內的階級地位的。惟其如此，所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只一次企圖把知識者羣描寫成超階級的社會團體。因此，好像只有他們才有資格担任階級鬥爭中的『公正裁判者』，實際上也決不是這樣。所謂知識分子，極一般的說，是指在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存

在着的社會中，專門從事智力勞動的人。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就包含着技術家，事務員，官吏，醫生，學者，記者，律師，藝術家等等。在他們之中，有些被資本家的企業以薄薪僱入，作為其剩餘價值的源泉，和體力勞動者一樣的被剝削着，然而這種知識分子所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比起全社會的生產額來是非常少的，剩餘價值在基本上是由體力勞動所創造一事，並沒有發生什麼變更。

知識分子在他沒有生產手段這點上，雖然也跟體力勞動者一樣，但他們往往受資本家的僱用去作反勞動者的工具或爪牙。一些國家機關裏的大小官僚，乃至特務走狗，是不待說了。還有在勞動過程中盡指揮，管理任務的技術人員，也是幫助資本家來壓迫工人的。何況許多離開生產的上層知識分子，早已不是剩餘價值的生產者，而且是分食剩餘價值之餽餘的人。這種知識分子，在實際上已構成資產階級的一員，以高等技術家，政治家，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等等的資格，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分野上，積極執行資產階級的意志。因此，其本質也就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了。

以上是指的薪俸生活者的知識分子，此外，還有不是薪俸生活的知識分子，例如許多『自由職業者』的知識分子，在經濟上也跟小資產階級一樣，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乃至半無產階級分化。例如一個業醫的自由職業者，他一面可能成爲一個大病院的所有者，即一個資產階級的大經營者，另一面也可能沒落下來受僱於大病院而以領受薪俸來生活，且受其剝削。還有例如

一個大藝術家，一面可能成爲一個劇團或攝影業的所有者，即一個資產階級的大經營者，另一面也可沒落下來受僱於劇團或攝影業，領受微小薪俸來生活，其受剝削與那個業醫生者一樣。

除了把知識分子根據其經濟上的地位來加以分類外，還可以從別的方面，例如從社會的任務方面（即在勞動組織中的作用）來觀察。因此，企業上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領域上的知識分子，學術上的知識分子（例如學者），其社會任務也可以說是有區別的。特別是學術上的知識分子，或者說一個學者，規定他所屬的階級的主要標誌，並不是他的經濟地位的問題，是在他散佈了一些什麼社會意識到社會裏去的問題。因爲他是以傳佈和灌輸學術思想或社會意識到社會去爲職務的。馬克斯，恩格斯被稱作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由於這個原故，反之，對於那企業上和政治領域上的知識分子，都不能由其主觀意識來決定其所屬階級。例如一個企業裏的高等技術人員，或一個政治上的負責人，縱然他們抱有馬列主義的思想，無產階級的同情心。假若其立場與其行動，並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方面來，反對資本主義式的利用，他依然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所以知識分子是這樣從種種複雜的成分成立的，他決不形成一個固定的社會階層（如「中間層」那樣）或階級。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有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有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自然要佔少數。然而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原則上是不同於無產階級的，或者說是無產階級以外的階級。我們都知道：蘇聯曾經一方面利用舊時

代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希望教育他們向着無產階級方面，而另一方面又鑑於舊時代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曾孕育過反蘇維埃的空氣，以及鑑於隨五年計劃之進行而必然發生的技術幹部之大量需要，所以便喊出造就「無產階級的生產技術家的知識分子」的口號，這正證明知識分子是可以屬於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是什麼資產階級的範疇，不是僅屬於資產階級的。

列寧曾在一九二四年說過：「如果諸君把知識分子跟無產階級或農民對立起來的話，那麼，諸君是在把知識分子看成一定的社會階層，是把他看成跟無產階級或農民的社會地位之爲一定一樣，也是占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們集團。但是俄國的這一層知識分子，却正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不過諸君在說到下面這樣的知識分子時，那還未占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已經從自己的正常地位被生活踢出來，正要向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轉移。如果諸君把這樣的知識分子跟無產階級對立起來，却完全是不聰明的，無產階級跟其他一切現代的社會階級一樣，也不僅造出自己所固有的知識分子，而且還從所有一切有教養的人們之中獲得自己的同伴。」（見所著「革命的冒險家」一文）

斯大林關於蘇聯的知識分子的意義也說道：「任何統治階級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也是不行的。蘇聯的勞動者沒有自己本身的生產技術家的知識分子，也是不行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事，」（見一九三一年「經營員會議席上的演說」）

關於知識分子在勞動運動上的作用，會有不同的意見。尤其所謂工團主義者，曾經排斥知識分子

，這是他們犯了這樣一個錯誤的結果，即，他們雖是站在勞動階級應靠其本身來解放自己的正確原則上，但却把知識分子一概跟無產階級對立起來了。自然，對於沒有脫離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級過去或生活影響的知識分子，如許其參加勞動運動，是需要一定的警戒的。但那不能把知識分子看做本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我們應該知道給與無產階級以革命的世界觀，完成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正是馬克斯，恩格斯這樣的知識分子，而且還是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

D 流氓無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上述的基本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副次的階級——地主，小資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羣之外，還存在着有一種可稱為流氓無產階級的東西。這種階級雖然也叫做流氓無產階級，實際上，它並不能構成爲有一定經濟基礎的整體，因此，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各方面，也不起任何積極的作用。這究竟是一些什麼社會成份呢？這就是乞丐，浮浪人，賣淫婦，常習犯罪者等階級游離分子。所謂游離分子的意義，就是他們已從物質的或精神的勞動游離出來了的，並且連勞動力也消失的那種沒有生產手段的分子。因此，他們和一般失業的人和窮苦的人不同，因爲失業的人和窮人，並不一定是連勞動力都消失了的。但失業的人和由小資產階級窮困化的人，却不斷成爲流氓無產階級的主要源泉。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

這種游離分子，在無產階級或農民的革命運動中，雖然不是絕對不能改造的。但偶一不慎，總是害多利少。這已經被恩格斯在說到德國農民戰爭時所指責過。他們往往缺乏一定的認識與立場，易於被人按日僱來施行反動的宣傳，破壞罷工或打入工會裏，這在現在是誰都知道的事。這種流氓無產階級的發生，是與它發生的社會條件的繼續存在有密切關聯的。所以這不是什麼社會政策或慈善團體的活動無能解決的。任何階級社會，都有附屬於它的流氓無產階級，雖然在歷史上同樣採取相異的形態。它的澈底消滅或掃除，是階級社會的消滅或掃除。

以上我們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現在來說說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主要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如前所說，任何階級鬥爭，都是向各方面展開的，例如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其基本形態，也是經濟鬥爭，政治鬥爭，理論鬥爭（亦即文化鬥爭之一部分）這三方面。階級鬥爭是不可調和的。所以無產階級，在沒有推翻剝削者的時候，在沒有根據共產主義新的原則來改造全社會的時候，他們就不能從階級與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無產階級，如前所說，並不是一下就站在全體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道路上的。在無產階級發展的最初階段，它並不了解全體階級的任務及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它不過是當做「自在的階級」存在着，還不自覺為「自為的階級」。因此，「無產階級曾經經過了各個發展的階段。它的反對資產階級是和它的生存同時開始的。最初各個工人，然後一個工廠的工人，然後一個地方同一勞動

部門的工人，向着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各個資本家作鬥爭。他們進行鬥爭，不是反對資本社會的生產關係，而是反對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自外國的競爭着的商品，他們打毀機器，他們焚燒工廠，他們企圖恢復那已經消失了的中世紀的工人地位。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形成了一個分散在全國，並為競爭所分裂的群眾。……但是，隨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增加了；它被集合為許多較大的群，它的力量增大起來，並且它自己也更加感覺到了。隨着機器一步一步的消滅勞動的差別，並且把工錢差不多到處壓到同樣低的水平，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與生活狀況，也一步一步的趨於平均化了，有產者中間日益增長的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危機，使得工人們的工錢越發動搖不定，越發迅速發展的機器的不斷改良，使得無產者的生活狀況越發沒有保證，各個工人與各個有產者中間的衝突越發帶上兩個階級間衝突的性質。」（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說，起初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主要只是帶着經濟鬥爭的性質，主要只是爭取改善他們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而不是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經濟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最初形態。

再說到政治鬥爭。政治鬥爭之最明朗的意義，就是以打倒舊政權和建立新政權為中心的鬥爭，或者說是以打倒阻礙新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係和建立促進新生產力發展的新生產關係的鬥爭。所以這種鬥爭，當然不是跟以前一樣，僅是各個工人對各個資本家的鬥爭，而是統一的無產階級對統一的全

體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列甯說過：『工人的鬥爭僅在這時才成了階級鬥爭，這就是要全體工人階級的前進的代表們，都認識了自己是統一的工人階級，並開始不是對個別的主人進行鬥爭，而是對全體資本家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是對擁護這個階級的政權進行鬥爭。……』然打倒舊政權和建立新政權的政治鬥爭，不過是手段，打倒阻碍新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係和建立適應新生產力發展的新生產關係，才是目的。即建立新經濟秩序，新勞動條件及新生產關係，才是目的，所以政治鬥爭也可以說是經濟鬥爭之集中的表現。在經濟鬥爭中，無產階級組成了各種職業的部隊和其他職業集合體，例如勞動組合，合作組合，職工會等等。在政治鬥爭中，階級便要組成更堅強有力的領導鬥爭的機構，這種機構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政治鬥爭是比經濟鬥爭更高級的鬥爭形態。在政治鬥爭中，無產階級提出整個的要求，提出根本解決政治制度經濟社會制度的問題。在爲實現這些要求的鬥爭中，什麼勞動組合，職工會等，已不能負起領導的責任。這時領導鬥爭的，必然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了。何況爲使爲部分利益的鬥爭服從於爲全體利益的鬥爭，爲目前利益的鬥爭隸屬於爲永久利益的鬥爭，也非有領導無產階級全部組織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可。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切勞動組合運動，職工運動，乃至文化運動，都要由無產階級的政黨來領導。所以無產階級的政黨是把無產階級的鬥爭作成真正階級政治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沒有領導大多數無產階級及其他同盟者的統一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的一項最主要的原因；而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却是由布爾塞克維黨

，根據一切國際工人運動，根據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根據日常反對資產階級及專制制度的鬥爭經驗，教育俄國無產階級的不倦的有系統的領導所準備起來的。

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高級形態，而政黨的領導又是政治鬥爭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條件。

最後說到理論鬥爭。所謂理論鬥爭，是要把社會主義的意識灌輸於工人運動中，是要把自發的運動提高到自覺的政治鬥爭的水準。這樣，無產階級的政黨就要倚靠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的政黨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自覺的階級鬥爭。任何一個喪失了革命意識和革命目標的工人運動，亦即任何一個帶着自發的性質的工人運動，一定會變成資產階級政客的俘虜。所以列寧在和「經濟主義者」的鬥爭中，不只一次指出了在工人運動中，對自發性的屈服及把自覺性的作用降低，這就是等於加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也就是使工人運動服從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以無產階級理論的鬥爭，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和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平行的一種基本的階鬥爭形態。不過理論鬥爭仍要服從於政治鬥爭的目的，並解決政治鬥爭的任務，所謂理論的黨派性，就是從這裏發生。沒有理論的黨派性，沒有理論作為黨派之指導方針，黨派是不能有所作爲的，試看在階級鬥爭的最初階段上，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與社會主義（理論）是各別的存在，因而革命運動是自發的，社會主義也是空想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在它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統一上生長並發展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燈塔。理論的任務是給與鬥爭

的真正指針。這種指針，是在詳細研究了各種鬥爭的形態之後產生的。理論探求鬥爭的來踪去跡及其一般的性質，一般的目的，而以消滅一切壓迫與剝削爲終極目標。理論是鬥爭的精神武器，無產階級政黨只有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武裝起來，才能領導無產階級作階級鬥爭，才能使無產階級獲得解放。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三種基本形態——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是統一分的整體。然其中以政治鬥爭爲最高級的鬥爭形態。經濟鬥爭和理論鬥爭，都應服從政治鬥爭，即應當服從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無產階級全部利益，爭取消滅資本主義剝削以及剝削的鬥爭一般，爭取無產階級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

最後我們的必需指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有着國際性質的。它在世界各國對資本主義進行鬥爭，對各種剝削進行鬥爭，把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統一的力量來對抗剝削者鬥爭的統一力量，它在它的旗幟上，大書特書：『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國際工人聯合會，亦即馬克斯、恩格斯等所領導的第一國際，就是無產階級這種聯合的表現。列寧和斯大林，繼承了馬克斯和恩格斯的事業，他們是第三國際的創立者和領導者，由於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成長成熟，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斯大林雖然宣佈解散了第三國際，然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仍然是緊密的，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

第四、我們來具體的考察一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發展和尖銳化，是和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發展處在最密切的聯繫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便達到了極端的尖銳。如果帝國主義以前的時代是工人階級準備革命的時代；那末，帝國主義時代，就進到了無產階級直接向資本主義進攻，亦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開始的時候，列寧就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並且提供了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單獨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理論。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果然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樹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揭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把世界分成了兩個陣營——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因為帝國主義戰爭，早就預定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端，戰後的時期，直接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之下，廣泛的展開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並在個別的國家採取了公開的內戰的形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奧國和德國的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巴威略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的工人佔領工廠，以及其他這些革命，雖然不是以無產階級的勝利而結束，雖然被資產階級在第二國際政黨的協助下鎮壓下去了，然而自後的無產階級不斷的繼續了他們的鬥爭，同時組織了許許多多的罷工，例如一九二六年英國的總罷工，起義，例如一九二七年維也納工人的起義。而在亞洲，中國的革命，也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基礎。

面對着日益加緊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都着慌了，在許多國家中都不掩飾的取消了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轉到了資本主義統治的別種形態——法西斯主義的形態。這是金融資本最反動的，最排外的，最帝國主義的分子公開的恐怖獨裁。法西斯主義，一九一九年在匈牙利獲得了政權，一九二二年在意大利獲得了政權，一九二三年在保加利亞獲得了政權，一九二六年在波蘭獲得了政權，一九三三年在德國獲得了政權，以及其他。然而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和猛進，不是說明了資本主義的強大，正是說明資本主義的衰弱。這是「資本主義已經沒有力量用議會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的老方法來統治的標誌」。〔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國際出身的工人階級的叛徒，他們的機會主義政策，剛剛替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

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一定社會階層的結果。『工人貴族階級』是機會主義主要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創造了機會主義的經濟條件，剝削和搶劫殖民地而來的巨額利潤，乃至額外利潤，給了資產階級這種可能性，即使用高額的報酬，許給很好的位置，甚至用直接賄賂等方法，來收買工人的上層分子，這樣就創造了工人階級中的機會主義分子，他們跑到資產階級的身邊，出賣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法西斯主義者在德國得到了政權，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破產了。這種結論，對於無產階級最落後的社會階層也成爲明明白白的。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竭力指出了工人階級極廣

大的羣衆都傾向共產主義的根據。在第三國際及其支部——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並鞏固了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而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更展開了並鞏固了反法西斯主義的廣大的人民陣線。克服了自己隊伍的分裂，克服了第二國際領袖們所採取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把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鬥爭，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和爭取勞苦大眾日常利益的鬥爭巧妙的配合起來，無產階級當時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下，準備着就要到來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決戰。

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時候，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同時又是階級鬥爭的領導者，嚴格的說，只有在有了革命政黨的時候，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才能提高至真正無產階級鬥爭的階段上，否定無產階級鬥爭中革命政黨的重要性，就等於把無產階級解除武裝，把它拿來編遣和分散。無產階級政黨是爭取無產階級解放的唯一的政治領袖和理論指導者。黨內不許有小組及反黨集團的存在，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因爲冷酷無情的剷除了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了。它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實現了並保衛了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使局部任務的解決服從整個階級基本任務的解決。它指導了工人運動，對工人運動指示了革命的途徑，並用理論、知識、和提綱武裝了工人運動，把大眾自發的運動提高到了階級自覺的水準上。

和無產階級政黨同時，自還有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例如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時，還創立了職工會、青年團、合作社、議會黨團、文化教育團體等等，爲了和那些作爲山黨到無產階級羣衆及其預

備隊的傳動帶，它們對無產階級都是必要的。無產階級政黨方面所給與的統一領導，是要不使這些組織關閉在自己的狹窄的範圍中，並且要把它們具體的任務和整個工人階級的主要政治任務聯繫起來，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聯繫起來。

鬥爭的戰略和策略，當然是更重要的。列寧取出了馬克斯·恩格斯的革命戰略和策略的基礎，把它們發展成了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完整的科學，發展成了獲取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斯大林繼續研究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戰略和策略，他把戰略規定爲：「戰略是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階段的基礎上主要突擊方向的規定，適合革命勢力（主要的後備軍和次要的後備軍）的計劃的作成，爭取在這個革命階段的全部期間實行這種計劃的鬥爭。」「戰略要關涉到革命的主力 and 它的後備軍」。（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在革命發展的一定階段，戰略是根本不變的，每個階段所特有的戰略計劃，都適合於每個革命階段。如果這個革命階段任務已解決，提出了新任務，適合於新階段任務的戰略計劃，才能被再提出。斯達林把策略規定爲：「策略是無產階級在運動的高潮與低潮，亦即革命的高漲和低落的比較短時期的行動路線的規定……」（亦見列寧主義問題）策略需服從戰略計劃，並服務於戰略計劃。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奠定了第三國際一切戰略和策略的基礎。它們透入了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決議案中，指出了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必要性，及在它的基礎上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的人民陣綫的必要性。大會警告各國無產階級的黨必需熟習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並且要

懂得依於階級鬥爭的行程和各國的具體條件，圓熟的應用這種策略，懂得依於實際情況，準備極快的改變鬥爭的方式和口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無產階級的黨才能把無產大眾結成統一戰綫，並推上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和資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保障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第五、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另一種方式，從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緩和，而是其加強和加劇，這在前面已經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正是這鬥爭加強加劇的一種表現。我們在說明了各種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並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後，還有說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之必要。這裏試就蘇聯建國三十年來諸階級及其鬥爭，變化，乃至現存狀況，加以說述。

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階級決不會馬上自動消滅，消滅階級和建設新的無階級的社會，是無產階級長期和持久鬥爭的事情，甚至於可說是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時代的內容。十月革命揭開了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同時，也就創造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時代。然在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初期，有五種經濟構造：一、家長制的或自然經濟；二、小商品經濟；三、私人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與這些經濟構造相適應，就有着下述各種階級：一、無產階級；二、中農；三、貧農；（農村半無產階級）四、殘餘的資產階級，富農等等。但他們裏面的主要階級，是無產階級

和農民，尤其是貧農。中農是有着雙重立場的，從一方面說來，他是勞動者，他們的根本利害關係是和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一致的，但從另一方面說來，他又是小資產階級，他們的農場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是小商品生產。作為小資產階級，他的利害是接近富農的。因此，在蘇聯，是無產階級和貧農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領導中農，對資本主義的要素（殘餘的資產階級，富農）作繼續的鬥爭。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自己成了統治者以後，著名的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是被擊倒了。然而那些資本主義的要素，資產階級的殘餘，富農，投機商人等等，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表現了瘋狂的反抗，採用一切可能的鬥爭形態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例如怠工，謀叛，恐怖行為，暴動，內戰，危害及其他。所以這時候階級的對立及鬥爭，只存在於無階級級，貧農和資本主義要素之間，并不存在於他們與中農之間。

中農這一階層，在農業已經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原是向兩極分化的，一方面分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分化為農業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但在蘇聯，中農却成為次於無產階級的主要階級。中農在蘇聯所以成為次於無產階級的主要階級的原因；一是由於俄國的農業，在十月革命以前，含有農奴制的遺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低級的，所以階級的分化很遲緩，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制度又抑制着農民的分化，所以中農並未消滅，反而成為主要的階級，直到農業集體化時代，中農便變成農村的台柱。中農的富裕部分分化為富農，其貧困部分分化為半無階級級傾向，固然是不能完全

避免的，但蘇維埃制度，却儘可能的阻止這種分化傾向，一面使中農自動的加入集體農場，提攜他們，指導他們，另一面又依據貧農，制止富農，杜絕中農富農化的影響，並進行對富農的清算，同時又企圖產業技術的發展，使集體農場迅速脫離手工農業的束縛而進到機械化，電氣化的領域，亦即使它達到社會主義農業的領域。

所以蘇聯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是由於革命的階段不同而變更着的。例如在俄國革命第一階段的主要口號，是『聯合全體農民，在資產階級中立下，反對沙皇和地主，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其主要口號，則為『聯合貧農，在中農的中立下，反對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主義，爭取無產階級的政權。』（均見列寧主義問題）以貧農為支柱的無產階級和中農的同盟，這是十月革命後，蘇聯無產階級關於農民的一切政策的基礎，在內戰的過程中，在反對那些企圖恢復資產階級地主制度的干涉者和白衛軍的鬥爭中，在反對富農的鬥爭中，發展了並鞏固了這種以貧農為支柱的無產階級和中農的聯盟，這種同盟，是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中農、貧農）根本利害關係共同性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消滅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在這種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同盟的主要任務。當時列寧認為：『擁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因為只有在它的基礎上，工人階級才能使農民和資產階級徹底分離開來，才能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才能保持領導地位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四六〇頁）

蘇聯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也就是列寧、斯達林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的卓越理解，然而在當時會被托羅茨基派和右派機會主義者所反對。托派否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右派機會主義者否定經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展開來消滅階級的道路，他們却主張由資本家自然生長為社會主義的那種富農的理論。但蘇聯共產黨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粉碎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也粉碎了右派機會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也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權來爭取經濟上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階級鬥爭並沒有停止；寧可說它是採取別種形態，並提供各種各樣的階級鬥爭形態，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鬥爭有着一種五種基本形態：一、鎮壓那些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動者的反抗，如前所說，他們的反抗，是以怠工、謀叛、危害，恐怖行為，影響小資產階級等等形態表現出來的，二、進行那些被推翻了的反動者和外國干涉者，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初期所發動的內戰。三、爭取小資產階級的中立，亦即爭取中農的中立，這是用經驗的教訓，說服，例證（例如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經驗對於社會主義大農場之顯著的優點的指示），用暴力來切斷偏向等等所聚成的，後來這種中立，更匯成了以食農為支柱的工人階級與農民之堅固的同盟，在這種同盟中有着有力的無產階級領導。四、爭取利用資產階級的知識、技術、經驗來管理經濟、軍事等，即利用資產階級的專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後來更養成了無產階級自

己的知識分子及技術幹部。五、創造，養成新的紀律，爭取對勞動和社會財富等等的社會主義關係。

經過了各種各樣的階級鬥爭形態，第一屆五年計劃引來了階級狀況重大的變更。這時組織了並展開了社會主義全線對資本主義要素的進攻，完全肅清了失業，並且在勞動大眾中，發生了對勞動關係的根本改變，勞動變成了光榮的事業，名譽的事業，英勇的事業，社會主義要素，成了全國國民經濟中支配的形態，蘇聯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家，粉碎了最後的資產階級——富農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澈底並不可阻擋的被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解決了。然而這仍不能說就停止了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巨大的歷史意義的成功，在被擊敗的最後反動份子那裏，惹起了獸性的憎惡和絕望的掙扎，他們混進了社會主義企業，運輸機關，蘇維埃農場及集體農場中來反抗社會主義，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

然而和無產階級結成了同盟，並接受了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却和資本主義澈底斷絕了關係，毅然決然加入集體農場，並積極參加把最後資產階級——富農階級當作階級肅清的鬥爭。因此，在鄉村中，集體農場制度勝利了，這種集體農場是以生產手段的社會化，及集體勞動為基礎的，是用最新的技術裝備了的。蘇維埃政權，不僅在工業中取得了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且在農業中也取得了這種基礎。集體農場的農民，變成了無產階級强有力的支柱。全面集體化和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斬斷了鄉村中種種剝削和貧窮的根源，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鞏固集體農場的事件中，在集體農場布爾塞維克化的事件中，這種種的成功，開闢了使農民走到富裕和文明生活去的廣大的道路。農民的大多數都

成了集體農場員，確信的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集體農場員，已不是小生產者的中農和貧農，而是已經變了質的新的農民，是社會主義的構成分子了。

接着第二屆五年計劃和任務的成功執行，保障着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並不可阻止的勝利，社會主義的經濟，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中，都成了完全的支配者。蘇聯各民族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群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堅實基礎。蘇聯已經肅清了一切剝削階級，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根本差異已經沒有了。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階級差異的殘餘，但他們之間的階級界限，總在一天一天的拭除着。斯大林說：在蘇聯「沒有了互相對立的資本家階級和被資本家階級剝削的工人階級，我們的社會，專門是由城市和鄉村的自由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所構成。」（見所著「列寧主義問題」）因此，蘇聯各社會階層生活的改善，文化和技術水準的提高，需要的滿足和發展，是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勞動生產性的增大，和社會主義文化水準的提高相聯系着的。

不過這種社會主義的各社會階層，他們剛剛由階級社會的內部走出來，由於過去歷史來源有着不同的途徑，因而不可避免的還保留着某些非根本的差異。例如工人是在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中勞動，這種企業，根本上已是國有的全體人民的財產，他們勞動的全部生產品，都加入全體人民的基金中，由國家去分配，他們依於所支出的勞動量和質來領出工資，他們還依於自己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來領導農民，爭取消滅階級的鬥爭。因此，他們是全體勞動大眾的先鋒，他們是在階級鬥

爭中久經鍛鍊的，最有經驗的，最有教養的，最有紀律的階級。在階級鬥爭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他們自己再教育了自己。所以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直到完全克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當工人階級還沒有把其他的社會階層，尤其是農民階層的政治自覺性，革命積極性，以及其必需的文化水準提高到跟他們自己一樣的時候，工人階級仍不能放棄其對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鋒的地位。

農民——集體農場的農民（除極少數單獨經營農場的個人以外），他們雖然都在集體農場裏作工，他們也使用着社會化的生產工具，採取着社會主義的財產形態，例如集體農場的一切生產品，扣除全國的需要，以及種子和保險基金的部分以外，其餘的部分都是拿在集體農場員之間來分配的，其分配也是以每個集體農場員的勞動的質和量做基礎的，這就是集體農場收入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形態。因此，它消除一羣集體農場員剽竊別群集體農場員的勞動或生產品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它消除了任何一種剝削形態。然而儘管是這樣，在工人和集體農民的勞動性質中，仍然不免有暫時的若干差異，這就是農業勞動還沒有完全變成工業勞動，農民的意識，勞動紀律，文化水準，還不能同工人相比，尤其在落後的集體農場那裏，還沒有根絕某些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和習慣，對社會主義的財產關係，還沒有根絕資本主義的殘餘觀點，甚至還有貪慾、投機、破壞勞動紀律的企圖，把集體農民所有個人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對立的企圖，所以儘管是集體農場的農民，也還不能同工人階級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已沒有根本的差異。

蘇聯知識份子群，已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參加者，新技術的名匠，工程和技術工作人員，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指揮者，國家和社會機關的工作人員，他們已和工人、農氏一起，共同進行了爭取社會主義，爭取提高勞動生產性，爭取提高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準，爭取訓練幹部等等的鬥爭。所以蘇聯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是由工人和農民出身者的工農化的知識分子了。然而由於一般人對於舊知識分子一種傳統的厭惡，蘇聯仍不免有人對於新知識分子表示不信任的態度，斯大林認為這是錯誤的。試看他說：『對於舊的，革命前的那些服務於地主資本家的知識界，採用關於知識界的舊的理論，即指明對它必需抱不信任的態度並與它作鬥爭的理論，是完全適當的。現在這個理論是已經過時了，已經是不適宜於我們的蘇維埃的知識分子了。對於新的知識界，需要運用新的理論，即指明必需用友愛態度對待這個知識界，必需關懷它，尊敬它，必需和它合作，以造福於工農利益的理論。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所以尤其使人驚奇詫異的，就是雖然在知識界地位中有了這一切根本的改變，而在我們黨裏面竟然還有人企圖把那種反對資產階級知識界的舊理論，用來對待我們新的蘇維埃知識界，對待這個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知識界，原來這些人認為那些在不久以前還是在工廠和集體農莊中按斯達漢諾夫方式做工，後來才被送到高級學校裏去求學的工人和農民，竟因此而不復是真正的人，而變成爲第二等人了。這樣說來，學識竟是一種有害而危險的東西哩！我們想把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農民，都變成爲文化的有學識的人，而且我們再過一些時候，就會做到這一步的。可是按這些奇怪

同志的觀點看來，我們的這種計劃是包含有莫大的危險，因為工人和農民一旦變成了文化的有學識的人的時候，就會遇到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險，也許這些奇怪同志再過一些時候，就會滾落到頌揚落後性，頌揚愚昧無知，頌揚黑暗，頌揚反動觀點的地步。而這是當然的，理論上的失足，從來沒有使人得到好處，而且也不會使人得到好處的。這就是關於我們的新的社會主義的知識界的情形，」（見所著「列寧主義問題」）

蘇聯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者，肅清一切剝削階級及產生階級對敵的根源的同時，鎮壓着敵意分子種種的反抗，鞏固着社會主義的防衛，為完全消滅階級差異的一切殘餘而鬥爭，為完全消滅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和人們意識中的一切殘餘而進行鬥爭，為把全體勞動者變成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的和自覺的工作者而進行鬥爭，為繼續提高勞動生產性，使社會主義生產品豐富，把工農的文化技術水準提高到工程技術工作人員的水準而進行鬥爭。所有這些鬥爭，都是為的要實現着列寧的這種指示「消滅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異，把大家變成工作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斯大林憲法的公佈已表現了一切差異之混滅。根據斯大林憲法，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資格，不僅和他們人種的和民族的屬性，信仰，教育，及住居年限沒有關係，而且和他們的社會出身，財產狀況，過去的行爲也沒有關係。這就是說在蘇聯肅清階級的任務解決了。但這并不是說，蘇聯已經完全沒有階級的敵人，國內的

國外的階級敵人都被肅清了，而只是說國內的剝削階級被肅清了，也不是說蘇聯就沒有階級鬥爭，國內的國外的階級鬥爭都可以停止了，而只是說國內的階級鬥爭被解決了。因此，國外的階級敵人，資本主義的包圍，還是很嚴重的，國外的階級鬥爭，防制資本主義的包圍，還是絲毫不能放鬆的。斯大林說：

「自十月革命以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了兩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者階級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鎮壓被推翻的那些階級的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的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起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起，一直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資本主義分子最後的餘孽，組織文化革命，組織保衛國家的完全現代式的軍隊。於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也因此改變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了，消亡了，因為階級已被消滅了，剝削者已不存在了，再沒有什麼人必需加以鎮壓了。代替鎮壓職能的，是國防範那些偷竊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武力保衛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因此紅軍，紅海軍，以及爲捕捉和處罰外國偵探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那個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是仍然保存着。國家機關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

作的職能，仍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那麼，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見所著『列寧主義問題』）

以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亦即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情形。

六 中國現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

階級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它是由每一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構造決定的。中國的現階段的歷史，從其社會經濟構造來說，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曾說：『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即自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一百年來，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半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見所著『新民主主義論

中國現時的社會既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就不能不受其規定而有許多特點。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毫無疑義的也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也有地主，農民，也有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羣，乃至也有流氓無產者。但中國的各社會階級，一定是不同於其他的國家的各社會階級的。試以無產階級爲例說起。中國的近代產業工人約有三百萬左右，他們當然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骨幹，可是無產階級並不僅限於產業工人。除產業工人外，中國在許多中小城市中，還有大批的手工業工人與店員職工，其數目約有一千二百萬左右，他們雖不是近代產業工人，但他們同樣是以出賣勞動力量爲生的無產者。此外在中國農村中，還有大批的僱農與手藝工人，其數目約在二千萬人以上，他們雖然也不是資本主義剝削下的近代產業工人，但他們也同樣是以出賣勞動力量爲生的農村無產者。所以大概說來，中國現在約有四千萬的無產階級，其中基幹的部分，最先進的部分，是三百萬左右的近代產業工人。

中國的無產階級，屬於農村中無產者的僱農，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近代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不發達，他們所受的還是地主富農半農奴式的剝削，所以僱農可以說還是半農奴式的工人。即就三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言，他們可以說是受三層的剝削：一、帝國主義的剝削；二、半封建的剝削；

三、資產階級的剝削。帝國主義在華的產業，不僅是用通常的資本主義的方法來剝削中國工人，而且很多都是用更野蠻的對待奴隸的方法來殘酷的剝削中國工人。同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為外貨的競爭，受不住帝國主義勢力的排擠與中國封建勢力的障礙，便只有以加緊剝削工人來苟延殘喘。因之不論是在中國資本的產業中或在外國資本的產業中，中國工人的工作時間總是很長的，而工資則特別少，中國工人不僅是受產業發展剝削的痛苦，而且更受產業發展不夠的痛苦，因為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障礙了產業的發展，加重了剝削程度，所以一切剝削還是封建半封建的剝削。由於中國工人所受剝削與痛苦的嚴重，所以它爭取解放的要求也最為迫切，而其鬥爭的目標，首先就要反對異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此外，應當指出，中國產業工人的比重，較之民族資產階級是來得大的。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能與外貨競爭而受到了限制，中國的產業資本，却除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業資本外，還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產業資本。而中國工人則無論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廠中做工，或在帝國主義在華工廠中做工，都是近代產業工人，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質與量，都不是中國脆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可能與之相比的。但就整個中國無產階級來說，如前所指出，它的組成部分是比較複雜的，其中有產業工人，有非產業工人。即令是產業工人，也經常有好些失業破產的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流進其中。因此，中國工人階級，一方面不易完全擺脫農民意識及行會觀念的影響，需要工人階級政黨（亦即中國共產黨）加強政治的領導，思想的領導去克服這些影響；同時，却因工人階級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

衆的聯繫異常緊密，它也便於去影響與領導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以上都是中國無產階級的許多特點。中國無產階級的又一特點，就是他們在中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由「自在的階級」走上「自爲的階級」之路，是很迅速的。如果說西歐無產階級的鬥爭，經過相當長期的轉捩抹角，才走上正確的革命的道路的話，那麼，中國無產階級却很快就舉起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旗幟，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西歐那樣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雖然中國民族改良主義有時也容易影響某一部分工人，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以外，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整個的革命階級。

正因爲中國無產階級，具有以上許多特點，所以它雖然在人數上說，還只佔中國全人口的較小部分，可是它却已經在它自己政黨的領導下，不僅成爲現階段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一個基本動力，而且還能對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起領導的作用，爲徹底完成中國民主革命并爭取革命進步的社會主義發展，爲爭取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最後解放而鬥爭，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中，聯合其他革命階級，聯合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并且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來共同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務。在革命發展到土地革命時，亦即集中力量對內剷除封建勢力時，儘管那時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會要離開革命，無產階級仍然要聯合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來爭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等到中國資產階級的上層，把他自己變成官僚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一同走向十足的反革命以後，它便成爲中國人民革命的唯一對象了。

再看農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如果沒有了廣大的中國農民參加，是決不能成功的，所以農民階級（就反帝反封建而言，農民是一個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基本動力之一，因為中國農民，處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并有商業資本與之相結合）的雙重剝削壓迫之下，迫切的需要得到解放。可是就反帝反封建而言，中國農民雖是一個階級，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究竟有了某種程度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在農民階級中，已不免起了某些分化。除一大部分農民，日益墜落為農村無產者的僱農而外，還有極大一部分農民成了半無產的貧農，他們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資本以至富農的重剝削之下，經常有完全破產的危險。此外，另有一很大部分的農民，是中國農村中的中農，是農村中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比貧農擁有較多之土地，他們自己耕種，間或僱用短期勞動（但不是重要的），他們差能自給，但他們也受到許多剝削，因之他們也時有虧空與貧窮化的危險。但他們是農民中最基本的階層之一（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二十）。最後，中國農村中還有一小部分是富農（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他們固然也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剝削，可是他們也剝削僱農，貧農，乃至中農。他們常時可以有些剩餘，但由於中國產業發展的限制，他們所經營的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因而他們的剝削還是封建與半封建的剝削。中國農民階級之已有如上種種的分化，對於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可能使力量分散；但不論僱農也好，富農也好，從大體上說，都需要聯合起來共同反帝反封

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一天不倒，中國農民仍是一整個的階級力量。倒是因為農民階級先天的弱點，他們不能有獨立的政策，因而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完成，雖然不可少的需要農民積極參加，但更不可少的還需要中國無產階級起來積極領導。

復次，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佔有相當大的數量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職員，以及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羣）。他們不僅數量龐大，成分也非常複雜。其上層分子，較接近於資產階級，因而容易走到反革命的方面去；可是廣大的下層分子，則深刻感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壓迫的痛苦，特別是知識份子羣，更為敏感，往往在革命運動中對廣大羣衆，起啓發的橋樑的作用。當然他們也由於其階級地位的先天弱點，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政策，並且一臨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易於動搖，因而不能在革命運動中起領導的作用。但就是僅僅那種啓發的橋樑的作用，究竟不能被忽視。所以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不僅能與工農一起澈底實行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而且其下層份子還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爲革命的往前發展而努力。中國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較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有其若干不同的特點的。

關於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各部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曾有如下的分析：

第一，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數十年來，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知識份子羣與青年學生羣。在這一羣人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并爲他們服務而反對民族的知識份

子外，一般是受帝國主義，封建殘餘，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使他們遭受到失業失學的威脅的。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有了現代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能够起着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顯明的例證。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份子與半知識份子，能够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斯，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廣大的傳播與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與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他們是很好的革命力量。但是知識份子在未與工農羣衆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爲工農利益服務并使其生活意識工農化之時，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革命知識份子雖有先鋒的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份子都能參加革命到最後勝利的。其中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時，就往往脫離革命變成革命的敵人，陳獨秀，李立三（按此人現已回到革命的懷抱來了——筆者）張國燾，就是這類知識份子的代表。知識份子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自大性，這種觀點，只有在長期羣衆鬥爭中才能洗刷乾淨。

第二，是城市貧民。這個階層中，包括破產了的手工業者、小販，離鄉別井到城市尋找職業而不得的農民，以及大羣依靠不定勞動維持生活的苦力。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羣衆，他們的地位，

大體和貧農的地位相當，是一種城市的半無產階級。他們的地位，推動他們起來擁護革命，并使他們容易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他們是很好的革命力量，和貧農一樣，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聯盟者。

第三，是職員。工商業機關中的職員，國家機關與文化機關中的下層月薪生活者，都屬於這一類。他們是依靠出賣精神勞動或技藝而生活的人，是不剝削他人的。他們受職業威脅又非常之大，因此，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這一類人是一個相當廣大的羣衆，經濟建設，國家建設，與文化建設，是不能離開他們的。

第四，是手工業者與自由職業者，手工業者是獨立生產者，是一個很大的羣衆，是現時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擔負者。他們不但遭受外國商品競爭的打擊，而且無力擺脫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羅網，所以他們能站在革命的方面，他們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他們當中的一部份是僱用很少工人的；另一部份則是不僱工人的。這一部份人是更加可靠的同盟者。整個獨立生產者階層，不但能够參加民主主義的革命，而且能够參加社會主義的革命。

自由職業者，例如醫生等等，他們是與手工業者屬於同一範疇的，也是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部門，也是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壓迫的，所以也是革命的力量。

第五，是小商人。他們一般是受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且是一個很大的羣衆。這

一階層的下層份子，是不剝削別人勞動而遭受高利貸剝削的，所以他們在革命中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只有那些剝削他人勞動而又同帝國主義買辦階級或封建殘餘有聯繫的上層份子，才是對革命表現動搖態度的人們。」

此外，還要說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民族工商業者，他們爲着本身經濟利益，需要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因而在一定程度與一定時期內，他們是可以參加反帝運動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有一定的關係，這不僅民族商業資產階級如此，卽令是民族工業資產階級，也是如此。

這樣，就使得他們雖然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及外資的壓迫，而在某種限度內還要依賴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例如在金融上，生產手段的供給上，交通運輸等等上。這就是中國吳蘊初，胡西園之流，一方面痛恨官僚買辦資本，另一方面又不敢脫出它們的魔掌的所以然。所以就是在反帝鬥爭上，它們也並不是怎樣澈底的，甚至於很容易在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階級的威脅利誘之下，反而和它們妥協。這就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動搖性。因此，他們對於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不惟不能積極參加，而且還不免要站在反對的方面。雖然他們爲着自身利益，也會提出過某種反對官僚軍閥政府（例如在他們沒有分得政權的時候）的口號以及某種改良土地關係的計劃。可是在真正廣大的人民力量起來，發展土地鬥爭時，他們又很可能與地主豪紳官僚軍閥一起來反對人民的力量，成爲土地革命澈底反

封建的敵人。這些就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顯著的特點。關於這，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曾清楚明白的指出如下：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按即民族資產階級——筆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與北伐戰爭時期，即資產階級還沒有當政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與舊俄帝國資產階級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有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有建立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的可能。但同時也即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與帝國主義分裂，並且同農村中的土地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就不願與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與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

國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而且他們又在一九二七至三六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并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背叛過自己的革命綱領，反對過當時的革命人民。在抗戰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爲代表，又已經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新的叛變。……（按大資產階級今天已整個叛變了——筆者）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更有如上所說的特點罷了。」（見所著新民主主義論）

此外，『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一書，也說：「民族資產階級中，又有大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差別，在大資產階級，那是妥協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份，而在中產階級，尤其是中等工業資本家，則是比較多帶革命性的部份。」

以上所說大資產階級，在今天已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已變成了全中國人民的惟一敵人，已變成了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馴順工具。當再詳論之。

最後，我們說到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國的大地主階級大到怎樣，我們只要看下面幾句話，就可以知道：『中國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就一般情況來說，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殘酷的剝削農民，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僱農、貧農

、中農及其他人民，却總共只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終年勞動，不得溫飽。『中國大資產階級，有人說大約可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買辦資產階級，另一部份是民族資產階級。因此，所謂大資產階級，除了買辦資產階級外，就是大民族資產階級。大民族資產階級，如前所說，原是不願澈底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也就是說他們是與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有緊密的聯繫的，然而他們的確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有過一些革命的表現。但他們經過無數次反革命後，在中國人民力量異常壯大，土地革命日益展開的今天，他們已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已與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封建大地主合成一體了。這一反革命階級的代表者，在今天就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國四大家族』的著者陳伯達先生說：

『全中國人口大概的數目是四萬萬五千萬。除了中國解放區一萬萬四千萬人口（按目前已不止此數了——筆者）已經由人民自己做了主人之外，有三萬萬一千萬人口還是在四大封建買辦銀行的統治之下，而這四大銀行系統的統治者，乃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四大銀行系統，就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它們的集中組織，就是四行聯合辦事總處。四大家族，就是蔣介石的蔣家，宋子文的宋家，孔祥熙的孔家，和陳果夫、陳立夫的陳家。他們的最高領袖，就是聯合辦事總處主席，也即是國民黨政府蔣介石。這個四大封建買辦銀行與四大封建買辦家族的統治特點，是經濟與政治的直接合而為一，並且經濟的力量，是直接利用政治的力

量，還利用政治公開強制的掠奪方法而發展起來。四大銀行系統直接支配着國民黨政權，並且以國民黨政權的「國家銀行」名義直接操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經濟，而四大家族的主人也不但直接統治四大銀行，並且直接集中國民黨政權的軍務、黨務、特務、政務、財務的大權，形成了以國民黨專政為政治形式的封建買辦的法西斯寡頭獨裁制度。」

這樣看來，四大家族，就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亦即中國的封建奴隸主，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接着四大家族的著者，便很明確的作了官僚資本的解釋，及其與買辦資本的關係。他說：

「近代中國所謂「官僚資本」不是別的，正是代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利益而在政治上當權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一方面掠奪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一方面壓迫民族自由工業而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本。這四大銀行與四大家族，便是這種官僚資本最集中的代表。這種官僚資本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金融資本。它和帝國主義國家獨佔的金融資本的形成過程，性質，及其活動，是完全不同的。它只能是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獨佔的金融資本的附屬物，由外國帝國主義所扶持起來。所以它又是買辦資本。它是近代中國買辦制度與封建制度的混血兒，是大買辦與大地主在經濟上的聯結物。而以這四大銀行與這四大家族為它最集中與最後的主要結晶。」

（見中國四大家族四至五頁）

這種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所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呢？那就是內戰、獨裁、賣國。『中國四大家族』著者在『題記』中，明確的指出：

『第一，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所以對內戰樂此不疲，便是因爲他們是從內戰起家，他們的財富堆集，是和戰爭完全不可分開的，他們認爲只有戰爭，戰爭，又戰爭，才是他們更便利於用各種形式以搜括人民的機會。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放棄內戰，實行和平，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二，所謂國民黨一黨專政，乃是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的法西斯專政；四大家族對於經濟獨佔的貪慾既是無窮無盡，要造成四大家族經濟獨佔的清一色，當然他們也要堅持四大家族政治獨佔的清一色，而要堅持他們這種政治獨佔的清一色，又就要不斷地從事內戰與恐怖。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放棄法西斯專政，實行民主，乃是一定不可能的。第三，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的財富堆集，本來又是和買辦活動完全不可分開的，並且他們爲着自己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獨佔，而和全體人民作戰，在人民中是絕對孤立的，他們只能依靠出賣中國主權，以取得外援，來屠殺人民，而把中國變成外國的附屬國與殖民地，因此，希望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不當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實行民族獨立，乃是一定不可能的。』

以上我們把中國現社會的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一一加以分析了。如還要說到中國現社會的階級鬥爭，就很顯然的會得到如下的結論

，即中國當前的階級鬥爭，乃是「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鬥爭，乃是四大封建買辦寡頭與全民族的鬥爭，乃是生與死的鬥爭，也是本書所展開的各種事實所證明出來了。或者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獨佔統治繼續下去，那便是中國民族的滅亡；或者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獨佔統治的瓦解與終結，那便是中國民族的更生。中間的道路是沒有，也不可能。」（亦見『中國四大家族』一書的「題記」）

但這還不過是較籠統的說法，在中國的階級鬥爭中，亦即在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實在還另有其他許多特點。很顯然的，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既然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當然就還不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是各民主黨派，個人（包括全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革命，又因爲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要在帝國主義階段完成，而中國又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革命任務，決不是資產階級所能解決——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動搖的——必需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所以其革命過程是異常複雜與曲折的。關於這一問題，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有非常精闢的說明：

「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兩個基本特點，毛澤東同志指出了，十八年中，（按現在已是二十六年了——筆者）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經歷過偉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重的革命失敗。經歷過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又經歷過這種統一戰線遭受分裂，並同資產階級進行嚴重的武裝

鬥爭。最近三年，則又處於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中（按指抗戰時期——筆者），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發展的道路，是在這樣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聯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單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基本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它是包括在政治鬥爭中的一種形式——筆者）。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中國革命鬥爭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這一特點，這一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特點，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沒有的或不同的。這樣：一，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二，革命形式主要是武裝鬥爭——就成了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裏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與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作爲基本特點，這是因爲：第一，這種關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這兩個特點，使得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與無產階級政黨的黨的建設問題，成爲黨在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的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間之關係，就等於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在十八年黨的歷史中，憑藉我們豐富的經驗，失敗與成功，後退與前進，縮小與發展的深刻的與豐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够做出正確的結論來了。」

關於第一個問題——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了：「十八年中，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的統一戰線，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三個不同的階段中間發展着的。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階段，十年內戰的階段，與今天抗日戰爭的階段（按現在又是另一階段——愛國自衛戰爭的階段了——筆者），三個階段中，證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於中國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够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軍閥的鬥爭的。因此，無產階級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的保持之。二，又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它就會動搖變節。因此，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變化的。在某一時期中有資產階級參加在內；而在另一時期，則資產階級並不參加在內。三，由於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就是在資產階級參加統一戰線並和無產階級一道向共同敵人進行鬥爭的時候，他們也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看做

是不利於他們的，而要加以限制，而要採取欺騙，誘惑，溶解與打擊等等破壞政策，並且拿這個政策作爲他們投降敵人與分裂統一戰線的準備的。四，無產階級的堅固同盟者是農民。五，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在同資產階級組織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厲的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反對對於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的革命的可能性的忽視，把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樣，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保持這個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左傾關門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反對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以及革命的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等看做一樣的東西，忽視他們原則之間的差別；忽視資產階級不但在極力影響小資產階級與農民，而且還在極力影響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力求消滅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而把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實歸於資產階級的一羣一黨；而一到革命與其一羣一黨的私利相衝突時，他們就實行叛變革命。我們如果忽視了這一方面，就是右傾的機會主義。過去陳獨秀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羣一黨的私利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兩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

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中間發展與鍛鍊出來的。這裏所謂聯合，就是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就是在聯合時有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所有這些，都是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證明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武裝鬥爭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鬥爭。它的歷史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資產階級的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黨開始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了解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十年內戰，我們黨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人民政府的根據地，而且已經能夠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與其他許多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起來。就是說，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線上的鬥爭，鋤奸戰線上的鬥爭，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都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的或者間接的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

土地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武裝鬥爭史的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與其他各種必要的鬥爭形式相互配合的經驗。這種鬥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國家中，在半殖民地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戰勝武裝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十八年來，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是密切聯繫於這一鬥爭形式的。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是不能了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十八年來，我們的黨是日益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鬥爭的這個路線。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位置，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關於第三個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志也指出了黨的建設的過程，有三個階段的特點。經過了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反對革命敵人的鬥爭和反對右傾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黨鞏固起來發展起來壯大起來。到第三階段，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偉大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裏走出來，變成了全國的大黨」。可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然建立了並堅持了三年之久，資產階級却時時刻刻企圖影響與破壞無產階級的黨，資產階級並想以反共作為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統一戰線，和拉中國向後退的準備。資產階級企圖溶化和取消無產階級的黨。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

級政黨及廣大人民的任務，「無疑是克服這種投降與倒退的危險」，堅持抗戰，團結，與進步。「爲達此目的，就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與反倒退的鬥爭。」在黨的堅決的努力之下，在它的堅強武裝力量與一切進步力量及廣大民衆的相互協力之下，「這些目的是可以達到的。」

上述三個問題的相互關係如何呢？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毛澤東）

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上述基本特點與正確處理上述的三個問題，就能够堅強有力地領導廣大民衆，去進行革命各個階段上的鬥爭，以爭取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以至將來革命轉變的勝利的實現。」（見吳黎平著『論民主革命』）

以上吳黎平氏『論民主革命』一書中所引毛澤東先生說的話，還是他在八年前說的話。這在中國階級鬥爭的整個戰略階段上，自然還是沒有變。但由於當前中國革命的深入，階級鬥爭的更加尖銳化，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目標，嚴格的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是消滅以蔣政府爲代表的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而最基本的問題，是澈底改革土地制度，依據土地

法大綱所規定的辦法，把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在這個目標和鬥爭的要求之下，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階級間的關係問題，亦即無產階級如何聯結和佈置共同盟軍的問題，也就是說如何來領導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當然要有某些新的情況。這在毛澤東先生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對中共中央會議的報告，亦即我們現在都讀過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已有明確的宣告了。

他在這篇文章中，簡單明瞭的規定了什麼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亦即什麼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他說：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鉅大資本，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及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峯，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의 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

他也很簡單明瞭的規定了什麼是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他說：

「被這些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繫，或者聯繫較少，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

尤其是他對於小資產階級的解釋，不僅簡單明瞭，而且具體明確，他說：

「這裏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指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業資本家。此外還有不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廣大的獨立的小工商業者。」

又說：

「中國土地法大綱有一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裏所說的工商業者，就是指的一切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及一切小的與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

但他也指出：

「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爲數不多的一部份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份子，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散佈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

至於只有無產階級是中國（按在世界也一樣——筆者）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最進步，最革命的階級，只有農民，尤其是貧農，僱農，當然也包括中農，是無產階級的鞏固的同盟軍。這是毛澤

東先生早經明確的指出過，是不待言的。那麼，在這種階級分野，或者說階級戰線之前：

- 一、大地主資產階級——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
- 二、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者；
- 三、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右翼份子；
- 四、工人階級，農民。

要澈底消滅的敵人是誰？要打擊他們在羣衆中的影響的是誰？最重要的是又將怎樣來佈置其同盟軍呢？這在毛澤東先生的報告中，也是交代得再清楚明白沒有的。他說：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

這是要澈底消滅的敵人。而要打擊的，則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右翼份子，他說：「當着他們的（指右翼份子——筆者）反動傾向尚能影響羣衆時，我們應當向着接受他們影響的羣衆進行揭露工作，打擊他們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使羣衆從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

但他接着就說明：

「但是政治上的打擊與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如果混合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新民

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的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需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份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所以：

「在新民主主義國家權力到達的地方，對於這些階級（按即指中小資產階級——筆者），必需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

這對於怎樣佈置同盟軍，怎樣領導民族統一戰線，是已經作爲一種理論根據在處理。這與他過去所著『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有一段話所說，仍是一脈相承的。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完全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就必需在各種不同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鞏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

究竟怎樣來佈置同盟軍，怎樣來領導民族統一戰線呢？他說：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其中說：『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各地愛國份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

這也就是同盟軍的具體形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強組織。爲『着徹底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澈底『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中『鞏固的同盟軍』，『可靠的同盟軍』，『在一定的時期中與在一定程度上上的同盟軍』，都包括在那一『最基本的政治綱領』裏面了。

這也就是『中國現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之最簡單明瞭而又最具體明確的分析和說明。至於怎樣來領導這一革命的統一戰線呢？他於最後斬金截鐵的說：

『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需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以上各項括弧內的文字，除引用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中的一項以外，都是『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內的文字）

不錯！我們要勝利，就只有根據對於『中國現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一科學的分析出發，奮鬥，前進。這也正如毛澤東先生所說：「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根本規律之一。」

(完)

附錄

一 社會主義社會的知識份子

S 何伐列夫作
樊英譯

「知識份子在蘇聯」之一——

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衛國戰爭中，蘇維埃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顯示了空前未有的英雄主義的典範。工人階級，農人，知識份子都獻身為蘇維埃祖國的自由獨立而鬥爭。

對於蘇維埃知識份子（其主要部份是在史大林五年計劃年間，即戰前時期培養出來的），這次蘇聯衛國戰爭乃是第一次的大試鍊。戰爭顯出，蘇維埃知識份子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他們是配得上自己的偉大人民的。

在戰後時期，蘇維埃知識份子與全體人民並肩忘我地勞動，以便在最短期間醫癒戰爭所帶來的創傷並加速向共產主義前進。蘇維埃知識份子是蘇聯國家的驕矜；這是新型的知識份子，他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份子有原則上的區別。

任何一個統治階級不能沒有自己的知識份子。在一切階級社會的機構裏都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腦力的勞動。

恩格思說道：「……當人類的勞動生產還這樣少，以致除必要的生活資料外所餘無幾的時候，生產力的增長，相互關係的擴大，國家和權利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造——這一切祇有在加強勞動分工的幫助下才有可能，而這種分工的基礎，就是在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大多數人和領導着工作，從事商業，政治，而後來也從事科學和藝術工作的少數特權人物之間的大規模的勞動分工」。（恩格思反杜林論第一七〇頁，一九四五年版）

自勞動分爲智力和體力後，智力勞動就被統治階級所獨佔，體力勞動則成爲被壓迫階級的命運。剝削階級利用科學和科學的一切發明來奴役人民大眾。若沒有幫忙壓迫人民的知識份子，他們就無法支掌政權。

政府官吏，御用史家，作家，僧侶，醫師，演員和藝術家等組成了知識階層，他們起先爲奴隸主服務，後來則爲封建主服務。像阿基米德，加利略，哥白尼這樣的獨立思想家真是鳳毛麟角，而且他們都遭受到官方科學，教會，國家的迫害。他們的命運就是自由知識和不自由社會間的不可解決的矛盾的實例。這種矛盾常常以最優秀人物的死滅爲結束，而這些人物在認識未知世界方面總是超過了自已的時代。

隨着社會的發展，知識份子的意義也增加了。在每個新社會的機構裏，由於生產力的發展，階級鬥爭的複雜，並且隨着人類文化的進步，知識份子的作用也日益巨大了。

在奴隸和封建的時代，受教育的人數是極少的。這是因爲那時生產水準的低下和技術發展的落後。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因爲生產力的劇烈發展，需要大量的智力勞動者，因此，知識份子就成爲一個大衆的階層。資本主義在國民勞動的一切部門中特別迅速地建立了行政階級制度和官僚制度，並且對知識份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它不但利用知識份子的代表作爲行政人員以管理國家，不但利用他們作爲統治階級的觀念論的表現者，（如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那樣），而且利用他們作爲生產過程的直接領導者。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的分工達到了極點。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公司，製造廠和以機器工業爲基礎的工廠中，勞動過程的智力職務完全和體力職務分離了。馬克思說道：「本來，腦和手是屬於同一個有機體的，在勞動過程中腦和手的勞動也互相聯合的。後來，它們分開了，甚至互相敵對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九四頁，一九三五年版）。

資本主義企業公司是智力勞動脫離體力勞動過程中的新階段。這個過程在製造廠裏更加強化起來，（那裏使工作人員降爲局部的工人），而在重工業內則告完成了，那裏面，作爲生產潛力的科學脫離了工人而被迫爲資本服務。智力勞動成了資本主義監工的財產，他們監視着那些祇做體力工作的工

人。「正如軍隊需要軍事司令官一樣，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由共同的勞動聯合起來的工人羣衆也需要工業的尉官，（經理等：……）和士官（技師：……），後者在勞動過程中代表資本家發號司令。監督工作就是他們的專門職務」（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四九頁）。

這些廠內的監督者——從技師，會計師直到工程師——和廠外的監督者——從廠長到資本主義托拉斯和股份公司的高級職員——組成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主要部份。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階級鬥爭的加深，由於剝削階級日難壓制被壓迫的階級，因此官吏，政客，法律家和記者軍隊隨之增長，他們的任務就是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奴役被剝削階級。

此外在資本主義下，特別在他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國際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因此必須保持大量的常備軍和無數將校的軍官。沒有這些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本主義國家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壓制被剝削大眾和保護並擴展本國領土。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知識份子主要是從資本家，地主，僧侶，富商和富農隊伍中徵集來的。列寧說道：「……一切農學家，工程師，教師——他們都來自有產階級；他們並不是由天而降的！不論在沙皇尼古拉時代，不論在共和國總統威爾遜時代，無產階級總不能離開車床，農人總不能離開犁刀而踏進大學。科學和技術祇是爲富人，爲有產者而設的；資本主義祇給少數人享受文化」（列寧全集第

知識份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是獨立的政治力量，因為他們完全依附於剝削階級並且祇爲剝削階級服務。這些階級的幸福，知識份子就當作自己的幸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社會任務是由資產階級的作用決定的。當資產階級是革命階級的時候，它的觀念也是革命的。當資產階級成爲反動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也就起着反動的作用。「……知識份子所以稱爲知識份子，是因為他們比一切人更自覺，更堅定，更正確地反映和表現出整個社會中的階級利益與政治集團的發展」（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三五四頁）

但是因爲知識份子是由各階級的代表所組成，並且因爲知識份子獨佔了智力活動，所以他們產生了自以爲是「超階級」的概念。知識份子把所有自己的勞動作品：科學，文學，藝術等。——都宣稱是超階級的。馬克斯和恩格斯說，在敵對社會中，智力勞動者「……必然是不現實的並且認爲自己的觀念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創造力量 and 目的，但是實際上，它祇是它們的表現者和象徵」（馬恩全集第四卷第四〇七頁）

在俄國，特別熱烈贊同這種觀點的是民粹派（從拉符羅夫和米哈羅夫斯基到二十世紀初社會革命黨的政論家們）。著名的民粹派政論家伊凡諾夫在俄羅斯社會思想史一書中稱知識份子爲「道德的，社會主義超階級的集團」，他們的特徵就是「新形式和理想的創造力」。

支持知識份子的「超階級」的幻想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在「超階級」的面具下資產階級的科學

更易瘋痺勞動者。在一九〇九年出版「里程碑」一書的變節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集團也企圖把自己的逃避革命解釋爲「人的崇拜」和「犧牲」。「里程碑」這本集子的作者之一——貝爾捷叶夫——宣稱，「超階級的知識份子是人類的那一部份，他們用人類精神的理想來征服了集團的狹隘性」。

列寧和史大林始終反對知識份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觀念論的解釋，並且指出他們是依附於資產階級的。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黨？」一書中寫道：「「知識份子」的成份和社會成份一樣：如果後者爲資本家所統制所支配，那末前者所發出的聲調也祇是資產階級的冒險家和僱用者的聲調，他們說：「知識份子」是知足的，安靜的，他們沒有任何妄想並且清楚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八九頁）

當說到「可笑的民粹派思想，說到知識份子的全能」時，列寧指出道：「……俄國的進步的自由主義的「民主的」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種「……俄國「超階級的知識份子」是「現實的社會力量，因爲他們代表一般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二九三頁）。

在人剝削人的社會裏，知識份子不是也不可能不是獨立的力量；智力勞動者在物質上服從於統治階級，他們是統治階級思想的表現者，是守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智識份子對於經濟和政治的統治階級的依附性在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厲害。偉大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在克里姆，薩姆金的形象中顯示了無恥的好詐的虛偽的知識份子向資產階級的諂媚和屈服。高爾基論及知識份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

用時，寫道：「知識份子的工作主要在於粉飾資產階級的生活，安撫在俗惡苦悶生活中的富人。知識份子是本家的保姆，他們大多數是熱心地用白綫綫補那早已破爛的骯髒的染滿勞動人民的血漬的資產階級哲學和宗教的法衣」。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中大多數知識份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事實並不就是說，知識份子的成分和他們的志向都是一樣的。列寧說道「……資產階級有不同的階層，他們又各有不同的歷史可能性。上層資產階級和富有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如律師，教授，記者，議員等等幾乎永遠熱心與普里斯蓋維奇派聯合一起，他們和資產階級之間有千百道的經濟的線路聯接着。

「反之，農民資產階級和新的「農民稱號」的知識份子跟無權的，被虐待的，無知的，飢餓的農民大眾聯接着，他們的生活與普里斯蓋維奇及其所有同盟互相敵對」（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八一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智力勞動跟體力勞動一樣都是買賣的對象。資產階級使智力勞動者成為自己的雇用者。知識份子像資產階級的雇工一樣遭受剝削。知識份子的勞動報酬跟工人工資一樣要依據市場的法則。生產過剩的危機和失業打擊工人，也同樣打擊知識份子（尤其打擊下層的知識份子）。

所以，無足為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行列中除了資本主義的熱烈擁護者外，也有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列寧說，資本主義下的知識份子：「……在其他階級中佔有獨特的立場，一部份在自己的關係，觀點等方面接近於資產階級，一部份則因資本主義逐漸推翻知識份子的獨立地位，把他們變為不自由的雇用者并威脅了他們的生活水準，而站到雇用工人方面來」（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十六頁）。此外

，在資產主義社會中也有個別的具有遠見的正義的知識份子，他們深知無產階級必然勝利，並且站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在資本主義進入總危機時期，這些較優秀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轉向更爲顯著。

在每一階級的敵對的社會文化中有二種文化。除了以擁護剝削階級利益爲目的的統治者的反動文化外，還有那進步的民主的文化，它是維護人民大眾利益的，在階級社會中，知識份子，因此就分成這兩種對立的文化擁護者。列寧指出，在俄國，一方面是——普里斯蒂維奇，古奇可夫，斯特魯夫的反動文化，另一方面則是契爾納雪夫斯基和普列哈諾夫的前進的民主的文化。民主俄國知識份子的代表——從拉其謝夫，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起，到陀勃羅留波夫，契爾納雪夫斯基，燕克拉索夫，柴霍夫及托爾斯泰等發展了進步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被人類最優秀創作的承繼者——無產階級——用來反對沙皇專政和資本主義的鬥爭。

無產階級正是那個階級，它肩負着接受和發展有史以來人類在精神活動和物質生產方面所創造的一切最優秀東西的任務。但是這些人類進步的成就要轉讓給無產階級祇有憑靠知識分子，要使這些成就增加也必需知識份子的協助。

起來反抗沙皇和資產階級的俄國工人階級，爲順利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卽爲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必需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需要有自己的理論。無產階級的理論必須是社會科學的最高成就。在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喪失了深入一切文化寶藏的可能性。在這困難情形中，

給工人階級以援助的就是具有遠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達到了真正科學地瞭解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因此成爲革命無產階級的公認的理論家。

社會主義的學說是從有產階級的知識代表們所研究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等理論中產生的。

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是再立了普洛美修的功績，後者從上帝那裏竊取了火的秘密，並把它告知世人，人民因得到這個秘密的幫助而學得了各種藝術。上帝爲這件事殘酷地懲罰了普洛美修，把他縛在絕崖上。

資產階級也這樣對待那些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向他們宣戰，迫害和殺戮他們，無產階級的導師——馬克斯和恩格斯是科學的熱烈支持者，他們的社會出身都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像普洛美修一樣，他們向工人階級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秘密，偉大的共產主義學說的秘密，把共產主義鬥爭的强大武器交給了工人階級。

在蘇聯，工人階級的偉大導師就是列寧和史大林。他們發展了馬恩學說，承繼了并且發揚了俄羅斯進步知識份子的革命鬥爭的傳統，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像俄國那樣的進步知識份子的解放鬥爭的優秀傳統。俄國解放運動的最初兩階段是首先與知識份子有關的：先和貴族知識份子（從十二月黨人到蓋爾青）；後與布爾喬亞商人知識份子（從契爾納雪夫斯基到「民意團」的戰士）有關。

承繼着俄國進步知識份子代表所展開的爲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光榮事業，列寧和史大林爲首的馬克

思主義者領導了俄國工人運動，率領了俄國工人階級和國內的一切勞動者去反對專制和資本主義，爲建設新的社會主義而奮鬥。

列寧和史大林暴露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資本家的阿諛和諂媚，指出了革命知識份子在工人運動中的重大作用。列寧和史大林固然反對唯心論的民粹派誇大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但同時也反對那些經濟派和孟雪維克派低估與輕視知識份子的作用。布爾雪維克嚴重打擊了馬哈叶夫采夫派的反動觀點，他們認爲知識份子，首先是革命的知識份子，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繼言工人的解放就意味着從知識份子的「羈絆」下解放出來。

在駁斥「經濟派」企圖使工人運動與領袖，與革命知識份子分離的時候。列寧指出道：「自覺的工人階級會珍視他們從社會民主黨的知識份子那裏得來的豐富的知識，和廣大的政治遠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二頁〉。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無產階級知識份子是由二個來源形成的：第一、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代表轉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第二、用培養自己的「工人知識份子」方法。列寧非常注意這個過程並指示各種方法促進工人階級出身的革命家的理智發展。列寧寫道：「當知識社會對於正義的非法的著作喪失了興趣的時候，在工人中間却產生了對知識，對社會主義熱烈的追求，在工人中間出現了真正的英雄，他們不管生活環境怎樣困苦，不管工廠中的繁重苦役，他們仍舊表現了剛毅的性格，堅強的意志

來學習，學習，學習，並直從自己隊伍中培養出自覺的社會民主黨員，培養出工人知識份子。在俄國已經有這樣的「工人知識份子」……」（列甯全集第二卷第五三頁）。從這種「工人知識份子」中還出現了這樣的工人階級的領袖如：巴布希金，加里寧，基洛夫等。

列寧關於培養職業的革命幹部的學說，首先就注意到教育這樣的工人知識份子，他們將組成無產階級黨的牢固基礎，在這些幹部領袖下工人階級將順利完成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由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俄國工人階級祇能產生少數的自己的知識份子，但是這些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起了傑出的政治戰士和羣衆組織者的作用。

二 斯大林論蘇維埃智識界

第二個問題，就是蘇維埃智識界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也如在國家問題上一樣，我們黨內存在有一些模糊見解和糊塗觀念。

雖然黨對於蘇維埃知識界問題的立場是十分明顯的，可是在我們黨內終究有一些敵視蘇維埃智識界而與黨底立場不能相容的觀點流行着。大家知道，這種不正確觀點底代表人物，以藐視和鄙棄態度對待蘇維埃智識界，認爲它對於工人階級和農民是一種異己的，甚至是敵視的力量。固然，知識界在

蘇維埃發展時期內，無論是按成份或地位來說，都已根本變更，而與人民接近並與人民誠心合作，因此也就根本與舊時資產階級知識界不同了。可是，這些同志大概是不肯顧及這一點。他們還是不厭重彈舊調，把那些在舊時，當知識界還替地主資本家服務時，本來是有根據的觀點和態度，不正確地搬來對待蘇維埃知識界。

在舊時，在革命前的時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知識界大半都是有產階級，即貴族，工業家，商人和富農等等出身的份子。在知識界隊伍中也有過小市民，小官吏，甚至農民和工人出身的份子，可是他們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在那裏起什麼決定的作用。整個說來，知識界當時是就食於有產階級和効勞有產階級的。因此，當時我國革命份子，首先是工人當然也就對知識界懷着一種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懷着一種仇視的心理。固然，舊時知識界也產生了個別和成十數的勇敢而革命的份子，他們接受了工人階級底觀點並終身把自己的命運和工人階級底命運聯結起來。但這樣的人在當時知識界中是太少了，所以他們並不能改變整個知識界底面貌。

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在外國武裝干涉被粉碎以後，特別是工業化和集體化事業勝利以後，當剝削制的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確立已造成了實際的條件，而使國家能規定新憲法並實施這個新憲法的時候，知識界底情形就根本改變了，舊時知識界中最有影響最熟練的一部份，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起，就已經脫離了其餘的知識份子羣衆，而向蘇維埃政權宣佈鬥爭，並去做怠工者了。這一部

份人也因此受到了應得的懲罰，而被蘇維埃政權機關打破和驅散了。後來，其中所留下來的多數人，都被我們敵人召募去做暗害份子和間諜，並因此而置身於知識界隊伍以外。舊知識中的另一部份，即熟練程度較差，但人數較多的一部份，很久還是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來臨，可是後來他們大概是覺得沒有其他出路，便拋棄了自己的念頭，而決定來做供職的人，決定來和蘇維埃政權和睦相處。這一部份舊知識份子大多數是已經年老了，並開始衰亡。舊知識界中的第三部份人，主要是其中的下層部分，他們比上述那一部份人底熟練程度更差，他們已和人民聯合起來擁護蘇維埃政權了。他們須要補習，而他們也就確實開始來在我們的高級學校裏補習了。可是，當時與舊知識界這種分化瓦解的痛苦過程並進的，還有新知識界形成，動員和積聚力量的洶湧過程。數十萬的年輕人，從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份子中間出身的人，進了高級學校和中等實業學校，他們畢業後就補充了知識界薄弱的隊伍。他們把新的血液注進知識界中去，並用新的方式，用蘇維埃的方式把它復活起來。他們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模樣來根本改變了知識界底整個面貌。舊知識界底殘餘已在新的蘇維埃的人民的知識界中溶解了。這樣就造成了新的蘇維埃的知識界，它是和人民密切聯繫着，其中絕大多數人是決意竭誠盡忠服務於人民的。

總結起來，我們現在便有人數衆多的，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知識界，它無論按成份或社會政治面貌來說，都是根本和舊時資產階級智識界不同的。

對於舊的，革命前的那些服務於地主資本家的知識界，採用關於知識界的舊的理論，即指明必須對它抱不信任態度並與它作鬥爭的理論是完全適當的。現在，這個理論已經是過時了，已經是不適宜於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知識界了。對於新的知識界，須要運用新的理論，即指明必須用友愛態度對待這個知識界，必須關懷它，尊敬它，必須和它合作，以造福於工農利益的理論。

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

所以，尤其使人驚奇詫異的，就是雖然在知識界地位中有了這一切根本的變更，而在我們黨裏面竟然還有人企圖把那種反對資產階級知識界的舊理論，用來對待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對待這個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知識界。原來，這些人認為，那些在不久以前還是在工廠和集體農莊中按斯達漢諾夫方式做工，後來才被派送到高級學校去求學的工人和農民，竟因此而不復是真正的人，而變成爲第二等人了。這樣說來，學識竟是一種有害而危險的東西哩。（笑聲）。我們想把所有的工人所有的農民都變成爲文化的有學識的人，而且我們再過一些時候，就會做到這一步的。可是，按這些奇怪同志底觀點看來，我們的這種計劃是包含有莫大的危險，因爲工人和農民一旦變成了文化的有學識的人的時候，就會遇到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險。（全場大笑）。也許這些奇怪的同志再過一些時候，就會滾落到頌揚落後性，頌揚愚昧無知，頌揚黑暗，頌揚反動觀點的地步。而這是當然的。理論上的失足，從來沒有使人得到好處，而且也不會使人得到好處的。

這就是關於我們的新的社會主義的知識界問題的情形。——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波）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三 論知識份子的改造

毛迅

在去年十二月一日「中央關於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中，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曾作爲一個重要工作而被提出。在這個決定中，中央很正確的指出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特點，估計了知識份子在中國革命中的任務與地位，並提出「工農幹部知識份子化，知識份子工農羣衆化」的口號。爲了積極響應中央這一號召，我們應仔細討論這一決定，仔細討論執行這一決定的辦法。這兒是我自己對這問題的一般的一點很不完整的意見：

（一）知識份子爲什麼要改造

知識份子之所以需要改造，是因爲知識份子本身存在有或可能存在有許多缺點。這些缺點是知識份子前進的障礙，是知識份子走向革命或實踐革命任務的羈絆。這些缺點及其根源是：

一、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由於中國工農勞動羣衆的貧苦。中國雖然一向號稱文明之邦，雖然「讀書」爲所有中國人所提倡，因爲「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半截神童詩一直流傳着，而「詩

「門第」，則爲多數有錢人家所標榜，可是中國的知識圈仍然非常狹小。由於中國工農階級的貧苦，整日在資本家地主的壓榨下，無休的勞動，爲着最低限度的生活，——糊口活命，尙且不暇，那裏還有這樣的有閒去讀書求學。再加中國方塊字的稀奇古怪難於學習，更使工農勞苦羣衆沒法向知識階級進一步。因而決定了知識份子的出身，大多屬於地主，資本家，最多的是有金錢可供子弟入學的小康之家的小資產階級。而知識份子本身的成份則多屬於小資產階級。由於出身與成份，階級的基礎，使一般知識份子帶有可厭的「動搖性」。

二、舊的知識的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的分離。求學的「學」大抵只是作爲升官，發財、謀地位的敲門磚，而書本的東西也大多只是一套空洞的理論，與實際毫無關係。故讀書要想學問淵博，只要閉門潛修，所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人書」，到爐火純清之時，則大功告成。這樣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內容，於是使一般知識份子大多喜歡「理論」，而不大注意實際，養成列寧所謂：「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最令人厭惡的一種表現」理論與實際脫離的傾向。

三、知識份子過去一貫大多是從事於精神的勞動，而舊的知識又告訴他「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因此遂認精神勞動之偉大無倫，過高的估計其對社會的作用與價值，輕視或者根本忽視體力勞動的應有的作用，因而有看重精神勞動看不起或輕視體力勞動的傳統與傾向。

四、知識份子養成的過程及其學習的方法與內容，都是「個人的」。「個人」的鑽研，「個人的

潛修」，「個人」的發展，爲「個人」而學，學「個人」的……這使得知識份子在生活中養成極濃厚的個人主義的習慣，自由散漫，無組織，形成自由主義的作風。

(二) 有什麼條件可以改造

但知識份子也有他的優點，基於這些優點，因而知識份子有改造的可能。

一、經濟地位一般多屬貧苦。根據前面的分析，知識份子的出身和成份，大多是屬於小資產階級。這些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的階級地位及知識份子在中國所受到的特殊待遇（如下面所說的），使得他們在經濟上的地位非常低下，極大多數——特別是前進的革命的知識份子幾乎可以說是全體都是非常之貧苦，而這貧苦對於知識份子，基於社會的諸原因，一般的都是愈來愈甚，很少有向上去的。經濟地位的低下與生活的貧苦，使知識份子不滿自己的處境而趨向於革命。

二、「知識」在中國。雖然「知識」在中國爲一般人所看重，「讀書人」普遍的爲一般人所尊重；雖然統治者也在那兒「普及教育」，「培植人才」，但實際上，「知識」却并不實際爲統治者所需要所重視。國家的任用人才，並不着眼於才，而是着眼於「關係」；乾兒子關係，妻舅關係，師生關係，同鄉關係等等一大套。如果「關係」好，則「青雲有路」不愁沒事做，因而裙帶官所在皆是，而那些沒有好姐妹好乾爹的真正富有學識的則不被起用，淪落天涯，徬徨着在那裏找出路。「畢業就是失業」，這一句在學生中頗爲流行的話，則幾乎成爲一條實際的規律。國家一面在鬧着人才缺乏，然

而許多中學畢業生，大學生，留學生則正遭遇着「知識過剩」的恐慌。這就是「知識」在中國的情況。這情況就使得知識份子不滿，使得知識份子爲了要生存，而不得不找尋他正當的出路。

三、階級與文化。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懦弱無能，自身力量的薄弱，以及無產階級力量的興起，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得不集中一切僅有的力量於軍事的措置與幹務特務工作的建立，而不能像英美等國的資產階級有那麼一筆餘款來培植自己的文化，雇用與發養一批無聊的文人。因而真正站在資產階級的文人，就寥若晨星，創作出品則更是可憐萬狀。在政治、經濟、藝術各方面不但沒有可觀的創作，就連古典的外國名作，也要依靠小資產階級或較爲前進的作家來翻譯介紹。雖然，資產階級也興起過幾次唐吉柯德博鬥風車式的「文化圍剿」，但幾次都在未正式交鋒前粉碎了，並且，就這可憐的「圍剿」也還要依靠武力及特務工作者的協助。然而，無產階級却在短時間內培養了不少的有力的文化幹部，創造了不少的成績。「左聯」一直就成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而「社聯」則成爲社會科學真正的領導力量。這樣，資產階級給予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於是便比較小（因資產階級沒有那樣多的貨色來影響），而他們受到無產階級前進勢力的影響則比較大。

四、知識份子本身。知識份子的本身，因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過慣了思維的生活，因而在理論上的認識力，理解力，思辨力都比較好，易於認識，理解，接受馬列主義的理論。

（三）改造的辦法

一，首先，我認爲應該從理論入手。因爲第一，知識份子容易接近理論。知識份子之走向革命，除社會的基本原因外，大多先從理論開始。第二，知識份子特別看重理論，他們的革命信仰一般大部份都係在這上面，他們之所以能奮鬥到底，也就是因他們認識了馬列主義這個真理，爲了真理，他可以犧牲流血。知識份子的動搖，除了他本身的社會原因外，大多是由於對馬列主義理論認識的不够。不過，對知識份子的理論教育應該特別注意：

一 理論與實踐的聯系。妨礙知識份子正確地接受馬列主義，正確的理解馬列主義的根源，就是理論與實踐脫離的這「惡習」。許多知識份子黨員，他在理論上可以說一大套，可以比工農份子了解得井井有條，然而一運用到實際，可就手忙腳亂莫知所措甚至錯誤百出了。理論與實際的脫離這在知識份子是一極嚴重的問題，故我們對知識份子的理論教育的內容，應該強調與實際的聯系——雖然我們的理論本來就是從實際中概括出來，而我們理論的特徵就是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注意用許多極富感性的例子來解釋和說明每一問題；不單使了解這問題是怎麼樣，而且應該更着重於了解如何「靈活運用」於實際；不要只是說「靈活運用」，而須着重指出「靈活運用」的具體辦法與例子。

二 由於知識份子有相當高的文化水準，有相當強的理解力。由於這些，再加上理論與實踐不能聯系的缺點，因而造成知識份子另一惡習，就是「好高騖遠」與「不够切實」。他們不大喜

歡基本理論，而追求的是較深的問題。常常對馬、恩、列、斯的哲學與經濟學的較深論題，能够背得一大套，說得天花亂墮；「矛盾的絕對性」，「統一的相對性」，「高級的質」，「質的轉化」，「黑格爾」，「費爾巴哈」，「康德主義」等滿口都是。然而「什麼是階級」，「什麼是黨」，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關係怎樣」等基本問題，却不一定能正確的完全的了解。這就使得理論建築在半空，以致不能很好的把握着原則，不能把高深的問題與基本的原則聯系起來。故在這裏對知識份子理論教育，應注意的第二個地方就是特別注意基本問題的牢固的把握與原則性的堅持的訓練，不要讓跑得太快，基礎還沒有打好就一步登天升到雲霧里去，再則特別注意高深細微的問題或較為抽象的問題與基本的大問題的聯系。例如不但使知道矛盾的絕對性，統一的相對性，明瞭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關係怎樣？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怎樣分別？質與量怎樣互變？並特別着重使知道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很抽象的問題，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總的問題有什麼關係。

二、理論與實際的脫離，前已言之，是知識份子一個很嚴重的缺點。對於這一缺點的克服，除了理論教育的內容與方法須特別注意如上面所述外，特別重要的是注意使知識份子多參加實際的工作與鬥爭，讓它在實際工作中去體驗了解理論的實際性。只有有了實際的工作與鬥爭，理論與實際的分離才能實際的聯系起來。因為工作與鬥爭需要的是極富實際性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一切脫離實際的

理論一遇到工作與鬥爭，馬上就會碰破而至粉碎。有的同志以為知識份子大多不能幹較為實際的工作，讓他寫寫東西做做文化工作倒還真能適合他的長處，於是不讓參加較為實際的工作，而只讓他弄弄理論寫寫文章，而個別知識份子的同志也認為這樣分配是很適當，顧到長處與特點，這自然是很合理的，但到底還不是完全之見。為了改造知識份子，為了使知識份子能很好的多做工作，應該大膽的讓他去參加實際工作（自然應該估計到他的能力），而知識份子本身也應抓緊參加實際工作的機會，注意多到實際工作中去鍛鍊。雖然在工作中，由於知識份子本身的缺點，在工作的開始，容易產生一些小的錯誤，但這並不要緊，因為一切的「正確」，都是從克服錯誤敢於碰壁中產生出來的。為了害怕錯誤，於是乾脆不讓動作，這是「因噎廢食」。

三、顧到特點「個性」，抓緊原則。知識份子由於過去生活、學習、工作的特殊的方式和環境，一切這些，規定了他們的特點，這些根本的特點，已如上述，對於改造知識份子，除了須詳細考慮顧及並根據這些特點外，對於知識份子，還須注意另一問題，就是知識份子的「個性」問題，這在工作中特別重要。因為知識份子都是喜歡自由，個人主義色彩極為濃厚。舊的狹隘的生活，舊的脫離實際的「知識」，使他們只是注意個人的活動和發展，因而便給自己造成了特有的「個性」，並且養成了非常尊重「個性」，對自己「個性」非常固執着的習慣。他們一向都認為：「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誰也不能侵犯損傷他的「個性」，故若在做工作時只抓住原則，不去理會或不特別注意「個性」，

則工作一定會碰壁。不過對於這些，應有兩個看法和態度。第一、在知識份子本身方面應該注意克服「個性」高於一切的惡習，事事抓住原則，事事從原則着眼。很冷靜的拿原則與個性比較，權衡它們的輕重。不要太注意自己的個性。第二、在領導者方面，應該：（一）注意每個人的「個性」，清楚認識到「個性」之於知識份子的意義。除了原則外，應盡量多多注意每個人的特有的「個性」——甚至細微的。（二）但另一方面，應該注意原則的把握，不要因為顧到「個性」，而把原則都丟掉。應該知道：原則到底還應該是重要的、第一的。對於妨碍原則的不好的「個性」，應馬上清除不讓存在，對於小的不好的「個性」，也得抓緊，注意克服——雖然應該是不要過於急躁，而要一點一點的去掉。同時，還更應注意用他本人的好的「個性」來克服不好的「個性」。在這里反對過左過右的兩種傾向，或者只是看到原則，或則專重「個性」。

四、末了，談到態度的問題。態度之於知識份子，與「個性」一樣，應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知識份子特別是黨齡較短沒有經過長期的鬥爭與黨的教育的知识份子，那種偏狹的自尊心與愛面子的習慣，非常根深蒂固。他們不單看事，並且看態度。有的甚至特別強調態度，「態度高於一切」，以至「態度決定一切」——雖然他們在理論上不這樣認識。一個問題的解決或決定，雖然他們很明白它的理由的正當，但要是態度不好，結果在執行的過程中，比較好一點的，做起來不高興不舒服；較差的就根本不願意去好好的做，最差的甚至根本不管你理由不理由，而抓住態度與他個人對立起來。

對於這問題，也像對待「個性」一樣，應該兩方面的。一方面犯有這個毛病的知識份子，應該知道特別着重態度是知識份子的一種不好的習慣，看問題多從事情本身着眼，不要特別注意態度的好或壞。另一方面領導的同志應該注意自己的態度，正確估計每個黨員的個別的水準與覺悟的程度。隨時檢查自己的態度的適當與否，應該知道態度的好壞，雖然不是一個嚴重的原則的問題，然而是一個不容忽視很重要的問題——特別對於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的改造過程，是一個鬥爭過程。一方面知識份子應勇敢地自己向自己的缺點作毫不姑息的鬥爭（有一些同志就有姑息、原諒、保留自己缺點，沒有勇氣作鬥爭的傾向），一方面領導者應抓緊這些同志的每一缺點，同它鬥爭到底。——這自然需要大的毅力與勇氣。

階 級 論

著 者 鄧 初 民

印 刷 者 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 港 馬 寶 道 六 四 號

• 權 版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

#54

171237

5 4 50

171237